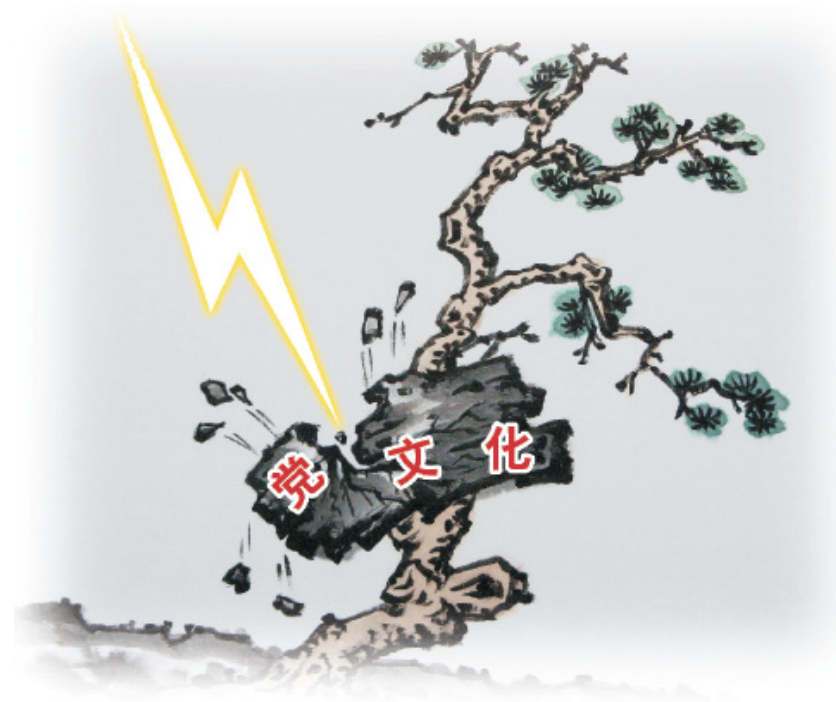


解体党文化

(中)

第四章：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2
第五章：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	32



第四章 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

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类历史，人们会真实地看到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喧嚣闹腾和血雨腥风。在短短几十年里，在神州的土地上，共产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轮一轮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输，构建起了一个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否定传统的神传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为其政治目的而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呜呼！血染神州，山河色变。五千年神传文化之根被切断了，人们不再认华夏始祖，而是甘做马列子孙，在短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改造了。

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韓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着人的语言、人的行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径庭了——人们习惯于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满嘴脏话，行为低下；目前的中国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了。

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 年是个分水岭。谈论起前三十年的历史，人们会觉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现在，觉得已经很正常了。是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人们不再讲“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了，人们甚至也高喊要恢复“传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是更臻成熟。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后人们的“科学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输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随着电视的推广，变得更加容易用“声情并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封网、过滤和监控。中共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是在抽掉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唯物论等思维模式来盗用传统，完全是为了现在人们追逐经济利益和国际认同这个根本目的来恢复的，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这是继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韵施行阉割之后，对传统文化的表面内容进行的第二次阉割。

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表现。

1. 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

虽然替代传统文化和改造人们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以一贯之的政策，但是，

突破网络封锁的办法

一、请使用以下方法获取动态网 ip 地址，然后使用获得的 ip 地址上动态网：

1. MSN

如果您使用 MSN 免费即时消息服务的话，可以用 MSN 免费即时消息给 dtwip001@hotmail.com, dtwip002@hotmail.com, dtwip003@hotmail.com, dtwip004@hotmail.com, 或 dtwip005@hotmail.com 发一个短信，一分钟内会收到几个 IP。

下载地址：<http://messenger.live.cn/>

如果看不到以上帐号在线，这是因为每个 MSN 帐号只能接受一定数目的人加其为联系人，超过后再加就显示不在线，实际很可能在线。用 MSN 上面的菜单栏里的“操作”那一栏，然后->“发送即时信息”然后->“其他”，然后会看见“输入电子邮件地址”那一栏，在里面输入以上帐号中的一个，如：dtwip005@hotmail.com, 然后点“确定”，就会出现和这个帐号的对话框，随便发几个字母就可以即时得到有效的 IP 地址。一个帐号不行，可以多试几个。

2. 雅虎通

如果您使用雅虎通的话，可以给 dynet_001@yahoo.com, d_web001@yahoo.com, d_web002@yahoo.com, d_web003@yahoo.com, d_web004@yahoo.com, 或 d_web005@yahoo.com, 发一个即时短信，一分钟内会收到几个 IP。或者可以把其中一个帐号加为“朋友”，一上线就可以从雅虎通中看到动态网的 IP。雅虎通可以在 <http://cn.messenger.yahoo.com/> 下载。您得有一个雅虎的电子邮件才能用雅虎通。

3. 电子邮件

给 ip@dongtaiwang.com 发一个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收到回信，拿到几个 IP。最好用海外邮箱。邮件可能会被当作垃圾邮件，请检查垃圾邮件文件夹确认是否已收到邮件。

二、在“下载软件”处先下载如下软件，以保证日后仍能上网

自由门 freegate 或动网通，适用于多数网络环境。绿色软件，超强度加密，安全可靠，上网不留痕迹；无需安装，下载后，双击执行文件即可运行。

短波：希望之声对华广播以多个频率向大陆播出每天 11 个小时的节目，收听范围覆盖整个中国大陆。节目内容以时事、历史回顾、民众心声等为主。

希望之声对华广播频率和时间为（以下皆为北京时间）：

早上 6-7 点，9635 千赫（每天），6280 千赫（星期六、日）

早上 7-8 点，7310 千赫（每天），6280 千赫（星期六、日）

晚间 7-9 点，7280 千赫（每天）

晚间 9-10 点，7310 千赫（每天），9930 千赫（星期一至五）

晚间 10-0 点，9450 千赫（每天），9930 千赫（星期一至五）

凌晨 0-1 点，11765 千赫（每天），9930 千赫（星期一至五）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方法一：退党网站

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动态网登陆退党网站即可填表声明退党

<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电子邮件

用国外邮箱给退党信箱发声明退党的电子邮件

tuidang@epochtimes.com

方法三：电话传真

退党电话 001-416-361-9895、001-888-892-8757、

001-866-697-6570、001-702-873-1734、

001-604-276-2569、001-514-342-1023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001-510-3720176

提示：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网通先拨17969，电信先拨17909，铁通先拨17991），或用手机 IP 电话拨打（中国移动先拨17951，联通先拨17911，小灵通先拨17909）。

方法四：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将退党声明张贴到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再上网。

方法五：利用出国的机会，将三退名单在国外通过上述方式发出或者交给退党服务中心义工。

提示：

- 1、由于中共对网络信息过滤，发邮件请用在外国网站上申请的邮箱，退党等词语用符号隔开。
- 2、中共对退党热线做了手脚，电话接通后录音告之：这是个空号。请别上当、不要挂电话，很快就能接通。

您可能说我也知道它不好，思想中早退了。但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对天发毒誓时，是说要把生命和一切都贡献给邪党，所以只有采取公开的形式（可用化名）、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

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语言却是变化无常的。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不管白猫黑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从“越穷越光荣”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从歌颂“张铁生交白卷”到现在学术界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学术腐败”，从昔日的“禁欲主义”到今天的“纵欲主义”……中共政策之出尔反尔，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人们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后的表现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变，人们总是盲目地跟着变，总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从而总是维护着恶党的统治。

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说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人们是相信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民公社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个声音，人们觉得当然就只会跟随恶党的思想和语言来思考来说话。

现在信息传递这么快，这么多，言论也比起过去不知宽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骂几声共产党了，人们都在做独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呢？

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民主自由早晚会的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的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

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地要让人们去接受的东西。只不过“造反有理”变成了“（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并觉得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们的思想更多的是被党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觉得自己能“独立”、“理性”地思考了。

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

不幸的是，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思考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共产党给予的，思考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在党文化框框中的“独立”，所谓的“理性”也不过是在党文化理论体系中的“理性”，很显然，这样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当然就是共产党所期望得的结果。

为什么人们“独立”地思考独立不起来呢？有下面几个因素。

- 1）“独立思考”中的党妈妈情结

“党就是一切、党就是母亲”，“命是党给的”，“饭是党给的”，这种“母子情”数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虽然现在不象过去那样露骨的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党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威权，对人们衣食饭钵的控制，依然让人觉得“国家就是党的”，“饭碗是党给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把党、国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个生活环境似乎都是党建造、赐予、维持的。这成为了人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越过共产党，想象不出没有党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外界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孩子大了，不就远走高飞了吗？可是，党文化的封闭式高压式环境是让人可以老，思想却长不大，那孩子能离开母亲吗？

2) “独立思考”的理论基础

人们思考问题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斗争哲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让人不相信在党之外还有“神和天”的存在。人们思考所依赖的基本词汇或者话语系统，仍然被赋予了党文化的含义，都是中共教会的语言，这就使得人们只能在党文化中打转转，人们甚至对于超越了“没有了共产党”这个底线的思维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惧。同时，政治运动依然不断，比如，最近二十几年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每一场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都是对党文化理论的又一次全面地强化复习。

3) “信息不完整”影响思考过程

人们思考问题的信息来源仍然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就连负面消息都是在党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转化为维护党天下的素材。俗话说“兼听则明”，一个人得到两个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都有道理的话，他就必须开始自己真正的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来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锁、过滤造成“信息严重不完整”，实际上切断了人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必要条件。再聪明的大脑，再有独立思考的愿望，也逃不出“无米之炊”的尴尬，这样的思考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独立理性”的思考。

4) “强权论”让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产党是强权，党是残酷的，跟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几十年的运动中得到的共识。就算是痛恨共产党的人，也因为畏惧强权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难越过共产党，觉得“你能把共产党怎么样？”，从而反过来以看破中共红尘的心态去附和中共，也跟着感慨“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人们普遍认为的言论宽松的象征——在私底下可以骂共产党了——其实，都是在党文化里骂，在骂中来理解党，最终维护现状，变相地拥护共产党。

影响人们独立思考的因素还很多。这种经过“思考”后仍然跟党一致的现象，比过去的直接灌输更有危害性。一旦认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就会更加相信那些观点，客观上造成更主动跟党一致，自然更便于中共来统治人民。如果说过去是一个被动地被塑造的过程，那么今天就是党文化发酵成熟和人们主动自律的过程。人们从过去的强行灌输到今天的主动自律、配合理解党的政策，“骂着拥护共产党”，正是共产党长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结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明天又会一样嘲笑自己的今天

一个很具讽刺的现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历史分成一个个时代，人们总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对党的政策给以拥护，而对“过去”的时间点上的很多事情，给以嘲笑，觉得那时怎么那么荒唐。如果把时间的坐标往过去移动，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纪元
2005年1月12日

通知：中国大陆退党人士 用笔名同样有效

日前，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人士日益增多。根据众多民众关心的问题，大纪元特此声明：鉴于中国大陆的特殊情况，从中国大陆退党退团的人士，用笔名、小名都可以，一样有效。

大纪元编辑部
2005年2月17日

关于销毁中共书画旗徽等物品的倡议

几十年来，中共的思想、中共的宣传无孔不入地深入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共邪灵附着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拥有大量中共的书籍、画像及音像宣传品。在中共的灌输、洗脑下，民众不知不觉地用共产党强加的逻辑去思维和行动。这个西来的幽灵给中国带来的是饥饿、死亡、战争等数不尽的灾祸。天真的人们竟然还把中共党魁的画像放在车中“避邪”。殊不知，那才是真正邪恶的共产邪灵的标记。共产党的物品散发着邪恶，随时毒害着人民。大纪元特此倡议：销毁共产党的一切书籍、画像、雕塑，清除共产党的旗帜、党徽等物品，不给邪灵附体留任何空子。

大陆的民众们，让我们彻底消除共产党伸向每个家庭的魔爪，从共产邪灵的阴影中走出来，共同开创美好幸福的明天。

大纪元
2005年3月22日

活中共基本不管；伤残活下来的，大多回到了农村，日子都过得穷困潦倒，晚景孤苦凄凉；当过俘虏后归国的，二三十年不能抬头做人。对越作战中，当年的“孤胆英雄”、“一等功臣”现在已经无人问津，死去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抚恤金 800 元到 1000 元不等，一次了帐，家属日后生活不闻不问。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埋葬着 957 位老山作战牺牲的士兵，其中 300 多位的家属二十多年从未来过，大部分是因没有路费而不能前来，有些家属来到陵园竟没有路费回家。

“党叫干啥就干啥”在今天的一个表现是追逐财富，因为中共希望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放弃其它的权益。而且共产党也一改以前的“消灭剥削阶级”的政策，连资本家都允许入党了。在平均身价达 22 亿的中国顶级富豪中，党员比例高达 48.5%，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然而在做了党的经济工具、为党忠心效劳之后，一旦分赃不均或者某处关节没有打点好，就立即面临牢狱之灾。牟其中、杨斌、周正毅、李经纬、张海等等纷纷锒铛入狱，“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囚犯榜”。利用共产党富起来的人，纷纷把子女财产转移到海外，因为教训已经太多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曾经拥护共产党的“资本家”们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就是明证。

上面谈到的是卸磨杀驴的部分，到了关键时刻，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连能用的工具都可以牺牲掉。文革结束时，在全国军管干部中有 17 人、警察 793 人共 810 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为蒙骗家属给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以隐瞒内幕，杀人灭口。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畏罪自杀了。无独有偶，江泽民也曾经通过美国的亲信试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象文革一样枪毙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来偿命，换取法轮功不起诉，还说可以比文革处理得更严厉些，可以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

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共都表现出“弃善从恶”的行为特征。然而中共行恶，必然假手党员个体，中共垮台以后，为罪行承担后果的也必然是党员个体，就象当年纳粹德国战败，纽伦堡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党徒一样。也就是说，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以“执行命令”、“执行公务”为由，帮助中共作恶的人，也许现在可以依赖中共政权的保护伞，暂时逃过正义的审判，可是中共垮台以后，每个人都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审判。那时，就再也没有中共的保护伞可以依赖了。

不仅如此。人间的法庭之上，还有天理的法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道家讲“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佛家讲因果关系，“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做了什么自己都去承受后果。老百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古今中外善恶有报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从历史来看，那些做了中共工具的人，不管当时如何风光，下场都是很凄凉的。这又何尝不是天理报应的体现？

人性中善恶同在，面对大的选择，心里常会有善恶交战。而在共产党员身上，情形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党员都有“党性”和“人性”的双重人格。“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号召的是压抑、灭杀人性，为了中共的独裁利益而行恶。在共产党恶贯满盈、迅速走向覆亡的今天，固执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其实是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守住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让正念而不是党来主宰自己的行为，退出中共，洗清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印痕，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会发现那个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样拥护那时党的政策，很可能还在那里嘲笑前天的行为。今天认为共产党可以迫害法轮功的人，倒退三十年，他一样觉得共产党应该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样觉得大跃进是如何英明正确。

说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都会嘲笑那时的荒唐。其实，今天的人们一样在用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自己觉察不到而已。

在连续几年取得农业发展之后，《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7 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人写回来的信。文章为了说明亩产万斤“一点也不神秘”，有声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更有科学家出来根据植物对太阳光能的利用，论证亩产潜力可高达 5.85 万斤。如今回首当时的言论和行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经济有了一些发展，于是在中共的宣传和灌输之下，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了个直线外推的思考模式：现在制造玩具出口，将来就能制造飞机出口；现在是贫富差距，将来是共同富裕；现在有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和医疗福利等各种问题，将来都会解决；现在环境被污染，将来自然会被治理；现在能源不够，将来一定会有；现在是群体抗争不断，犹如火山要爆发，将来一定会成为“和谐社会”；现在人们的道德日益败坏，将来一定会高尚起来；现在是经济发展，将来一定会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本世纪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

在那个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把大跃进变成了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空社。今天这种思想的危害绝不亚于当初，而且由于更隐蔽，人们不容易觉察，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思想是被灌输的，而今天人们的这种思想却是自己“思考”出来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本身很“唯心主义”，不过是表达一种气魄和决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学内涵被灌进了党文化，就变得极具毁灭性了。在极端唯物主义看来，这不再是表达决心，而是要变成实实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亩产指标，层层夸大的指标，是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不信神的共产党，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种莫名的东西冲昏了人们的头。党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见一斑。

昔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角鼓动人们不顾客观规律和现实，要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样激励着人们面对中国的危机熟视无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几年来的跛足改革带给中国巨大的危机，但人们不去监督中共，不去批评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体中共，而是不作为，甚至反对别人作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这一危机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愿解决，期望中共有能力解决，认真地重新演绎着二十一世纪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对中共的期望悖论：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政策的调整，都是因为来自党内党外的巨大压力，感

受到了“亡党”的危机才不得已开始了改革。也就是说，只有给中共压力，中共才会改良。光是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历史，不揭露中共现在的恶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纵容中共，中共就不会改良。于是，期望等于没有希望。

可以这么说，在人们盲目的“期望”中，所谓给中共三十年时间的幻想中，社会危机可能已经把中国破坏好几个来回。

更重要的是，“改良”对今天的中共来说，已经太奢侈了，因为中共积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愿、不敢、不会改良了。维护统治地位成为中共保住集团和个人利益的一切底线，在中国警察网上有一句醒目的口号，就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警察当作党的家奴，可见共产党是铁了心地“不会从良”，而人们的盲目期望更是给中共增加不愿顺应历史潮流的能量。很显然，今天的中共已经成为理性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障碍，只有把中共解体掉，让中国人民没有后顾之忧地来发挥一切聪明才智，自由讨论国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

下面我们举一些典型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人们是如何用恶党的思想和恶党教会的话语来思考问题的。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一个最大情结就是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如何认识共产党，共产党变没变，有没有希望等都变得非常困惑了。

1) 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视觉和感官对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被共产党整怕了、弄穷怕了的中国人民，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后，就很容易满足了。再经过中共一年复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联欢”的宣传，好象又闹起“赶英超美”，把人们整得飘飘然了，中共乘机浑水摸鱼，用经济的发展来为其执政合法性寻找依据。其实，经济发展同中共毫无关系，功劳属于勤劳的中国人民。有人说，只要有外商投资，只要有智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要有吃苦耐劳的工人和忍辱负重的农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国，也能在二十几年堆出一个繁荣的物质世界。

但是，这样的跛足发展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吗？发展的顺序问题，什么先，什么后，相互依赖关系等等，是现代管理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看看在中国表面繁华的后面是怎样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滞，经济体制的畸形，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贫富的差别，道德的堕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对人权、信仰和宗教团体的严厉压制，对民主自由的敌视，对言论和媒体自由的根本钳制，银行坏帐，金融危机，黑社会，娼妓，占大多数人口的弱势群体没有声音等等，以及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和快速增长的群体性抗争（2005 年达 8 万多起），等等，更别提天有不测风云的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在表面繁荣之下的中共政权，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为代价的，如果算上环境代价，中国这些年的实际 GDP 是负增长。

对于中共急功近利的经济畸形发展带来的潜在危机和可能的民族灾难，人们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对。一是屈服于中共的强权，觉得想也没用，还自找麻烦，二是觉得现在生活总是好了些，哪管这种发展能不能持续，只顾“闷声发大财”。而那些只为赚钱的外商和政客们，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从这世界上最后一块市场大饼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外界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这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外商不但没能把民主和自由带进中国，反而成为中共腐败食物链中的添加剂。

中国社会由此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坏和人性魔变；人们附和取缔法轮功，于是中华民族上演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信仰迫害。

从地富及其子女可以斩草除根，挖心吃肉，张志新被割喉管，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没有正式法律手续前就关押迫害致死，到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还需要多少教训来让人们从中共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洗脑奴役中走出来，不再跟从中共作恶？

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奴役中，中国社会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越是紧跟中共的人，受害越深。

中共称呼贫困地区为“老、少、边、穷”，老就是指中共曾经建立过的所谓“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能得到政权，很大程度上靠农民出人出钱出粮出命。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中共建政后，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努力帮助当地农民变富裕，对农民乱收费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不但用户口制度把农民捆在土地上，现在还强征属于祖辈的土地，再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商。目前的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曾经是“革命老区”，几十年过去了，可这些地方变得比中共建政以前还穷。

陕北是中共的“革命老区”，陕北的小米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在陕北居住达十年之久。树被砍尽，草被挖尽，米被吃尽，人被用尽，陕北百姓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后，陕北刚刚发现大储量能源，中共又打着“国家开采”的幌子，大规模开采，资源被调拨到其它地方，资源卖的钱，都归了中央企业，让当地继续受着中共的盘剥。

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夺权时利用工人搞工人运动，武装斗争；反右时让“工人说话了”，充当“反右派”的坚强后盾。文革时组织“工宣队”，让工人收拾武斗的烂摊子，镇压“四五运动”靠工人当“工人纠察队”。1989 年的学生运动中又拉拢工人，让工人置身事外维护中共统治。

中共建政以后，为了能够让工人跟党走，做斗争工具，可以为党劳动，曾经给过中国工人“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然而“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的是太子党、官员、白领、骨干、精英。中共自己的官方研究机构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而那些曾经“党叫干啥就干啥”、把汗水和青春都奉献给了党的工人们，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却被党毫不留情地抛弃，还送了一个好听的名词——“下岗”。国有企业数千万工人失业，工人在丢掉工作的同时失去了单位提供的一切社会保障，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等等。不但如此，工人对下一代的希望也被无情地击破，大学的学费工人家庭无法负担，就算是好不容易供到毕业，工人的子女没有靠山，也很难找到好工作。

军队是中共的命脉，党指挥枪，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对于每个士兵和军官而言，党叫干啥就干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共军队的退伍军人条例和待遇规定都是由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政策条文发布，随时可以变。一无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保障，二无统管全国退伍军人的部门或机构，中共用完后撒手扔回社会，士兵退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基本上没有后续的福利待遇。伤残军人更是无依无靠，找党中央去上访也无济于事，给北京的申诉信被上级转发下来以后，地方官员不屑一顾地说“是一堆废纸”，“告到联合国也没用”。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们，除了能呆在部队的，当了烈士的，家中亲人的生

高科技的恐怖分子比技术手段平庸的恐怖分子更可怕。当整个社会被裹胁着为一个邪恶的目标工作时，与其勤劳听话，不如消极怠工。

中共鼓吹，为了“党的利益”，党员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显而易见，中共提倡的“道德”、“荣辱观”等，只是在表面上与传统伦理有相似之处，骨子里是为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服务的。

大家都很熟悉“南辕北辙”的故事。一个人要到楚国去，尽管他有能跑的马，充足的旅费，本领高强的车夫，可是如果他把方向搞错了，永远也不能到达楚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马越好，旅费越多，车夫驾车的本领越高，只能使他离开楚国越远。当人们听党的话，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时候；帮着中共去欺骗国人，迫害百姓的时候；为中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大力帮助中共把中国社会拖向万丈深渊吗？

3) “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现时表现

现在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注重现实，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更不愿意为主义或者信仰而付出。于是，中共开始侧重“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个口号的另一个方面：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就是党不喜欢的都不能干。老百姓最常听到的说法是，“这件事中央都定性了，不让干就别干了呗！”

潜移默化中，中共划出了党让人干的界限：“创业”、“赚钱”、“一夜致富”、“炒股”、“美食”、“小资生活”、“时尚”、“白领”、“精英”、“汽车”、“房产”、“娱乐”、“休闲”、“聊天”、“激情视频”、“出轨”、“情色诱惑”……物质享受放开，任你放纵欲望，吃喝玩乐嫖赌抽随便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在这方面非常“自由”。许多中共干部也是“与时俱进”、“以身作则”。很多人可能纳闷为什么“越反腐败越腐败”，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腐败恰恰是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范围里，党要是真的不允许腐败、不给党员和干部好处和特权了，还有谁会给共产党卖命呢？中共自己就没法维持了。但是有一点，胡来可以，党不叫干啥就不能干啥——不能给党提意见，谈政改不能动真格的，不能严肃探讨社会问题，更不能对党的统治有看法。要是退党或者叫别人退党，党就更不叫干了。

在共产阵营崩塌，人们纷纷鄙弃共产主义的今天，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是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独裁。在这样的统治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大，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就业难，缺乏社会保障，贪污腐败盛行，道德败坏，环境污染，没有民主，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利，治安差、黄赌毒盛行，不讲法制，对公民上访维权的要“截访”。这些问题中共提可以，作为个人，就连说说也不行，不准“制作、查阅、发布、传播”含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它内容”。如果想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努力，或者在被违法对待时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那绝对是属于党不叫干的。

4) 不能不承担的后果

中共不定期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与人们放弃自己的判断、使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党叫干啥就干啥”意味着死心塌地追随中共的斗争哲学，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成全了中共的各种统治目的。

人们跟着中共杀人，于是几百万的“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人们跟着中共搞大跃进，几千万人死于饥荒；人们跟着搞文化大革命，

有学者把中国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别墅里享受着别有洞天，第二世界在为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费，第三世界正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5》一书，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美国 100 年，如果维持 9% 左右的经济成长率 100 年，才能进入世界前 10 名。维持 9% 左右的经济成长率 100 年，可能吗？有人评论到，下一个世纪远远不是“中国的世纪”。但在大城市橱窗式的繁荣之下，一个真正的中国被掩盖起来了。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一“俊”遮百丑，帮助中共披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现实的全面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共产党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们都知道做诗的功夫在诗外。同样，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决信仰、道德、法律、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只是共产党拖延体制改革的借口而已，但现在人们竟然毫无察觉，还以为是真理。其实就是陷入了党文化思维，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问题。中国人民现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体育和娱乐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区。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民是积极参与政治和制度的改良，争取自己的各种权利，而中国人民现在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敢于要求权利反中共迫害的民众，许多人不但不理解，还反对别人去争取权利，他们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幻想共产党的自动改良和恩赐。

2003 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引发广泛争议的电视剧，它就是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后遭禁播。该剧真实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开放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一点对中共来讲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电灯、电报、电话的，也没有火车和汽车。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它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橱窗。可是这个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没有。1905 年孙中山先生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

其实，今天的人们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基本常识，都知道越往后，修正的成本越高。关键就是在党文化的氛围之中，屈从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觉得发展经济至少对眼前短期有利，就跟着一点点的叫喊要“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而对中共的杀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 “稳定压倒一切”

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稳定”有特别的渴求。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鸣，成为中共新时期维护统治的主打口号。

说起共产党，人们联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动乱，怎么现在的中共却祭起“稳定”的大旗了呢？说起来很矛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共可以“动乱”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动乱”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稳定”了。几十年来肆无忌惮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把人民“动乱”得民不聊生，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觉醒，眼见要把中共“动乱”掉了，这时中共就高喊起要“稳定”了。

显然，中共说的稳定只是中共政权的稳定，而非国家和社稷的稳定。在中

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最需要“稳定”,以便“稳定”地捞取利益。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这种“稳定”可以高于良知和道义,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顾了。当矿井工人死于矿下,中共以“稳定”掩盖死者的冤屈;当拆迁户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访,幻想着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稳定”为名进行截访,甚至用“破坏稳定”对遭受不公者进行迫害打击……这样的稳定是假的,社会不公和矛盾积蓄到一定时候,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共产党宣传的“(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积累社会矛盾等待总爆发的过程,一旦危机爆发,我们今天拥有的财富都会化为乌有,民族又会遭到生灵涂炭。

大家知道,经济的运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稳定”的,动荡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础,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真正的稳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三百多年来保持高度稳定,人民自由,经济繁荣。有矛盾要及时疏导而不是强行压下,中共利用人们在各种运动中整怕了、希望稳定的心理,偷梁换柱,把它自己统治的稳定强加给民众。这种稳定是不稳定。

中共“稳定压倒一切”带来的代价,就是现在转型更难了,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压维权和异见人士,镇压信仰团体,封锁、过滤消息。中共在维护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原罪越来越大,已不可能指望着它有一天会心血来潮,大发慈悲,主动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3) “别人也一样”

中共很喜欢用“国情”来作借口。别人有民主,中国不能有,别人能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有,别人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坏事,中共这时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原谅中共的劣行。

说腐败,它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说镇压民众,它会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说民主,它会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变,它会说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说选举,它会说台湾的选举是多么混乱;说中国现在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它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言论自由,它说西方哪个媒体不是被财团控制?说天安门抓访民,它说你到白宫去抗议试试,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权不好,它抓住美军虐囚大做文章,说美国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

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别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导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东西。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应和处理问题的姿态。

和关有志一样,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人、打人、斗人、整人的人,事后不但不忏悔,还往往为自己鸣不平:他们只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已,自己只是党的一个棋子、工具,并不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都让人们做什么。事实上,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根本不需要共产党让人们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都要工作、要婚丧嫁娶、要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要进行发明创造,有精神追求,要进行人际交往。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活动,都不需要共产党鼓动人们去做。共产党所大力提倡、宣传鼓动的,可以说没一件好事,没有一样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都是为了维护它的一党利益。

当年中共宣传只有自己才真抗日,把很多热血青年骗到延安,可是进得去出不来,这些人被迫接受洗脑,后悔晚矣。其实,那时候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国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抵抗,真要抗日的話,根本不需要躲到延安。“解放全中国”是全面发动内战,推翻合法政府,把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从延安一隅推广到全中国。“抗美援朝”,搭上百万人命和高额军费,几乎拖垮了当时的经济,帮助金家流氓政权苟延残喘,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跃进,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范围的大混乱,死伤无数,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优秀人才花果飘零,传统文化摧残殆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千万知青失去求学的机会,把大好青春抛掷在农村和边疆。

因为中共宣传的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显得尤其可怕。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天理,只要能够讨党的欢心,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什么坏事都敢干。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迫害法轮功。很多警察以迫害政策为借口,说是上头叫干的,因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甚至将人活活折磨致死,还有的跟黑心医生勾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两大创举,其实都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不管的结果。老百姓自己最知道怎么样管好自己的生活。中共什么也不做的时候是老百姓日子最好过的时候,中共一有所动作,必然给人民带来灾难。过去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

2) “驯服工具”为什么目的服务

中共不单单赤裸裸地号召人们“党叫干啥就干啥”,利用煽动起来的政治狂热和各种封闭式的洗脑,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愚弄、控制和指挥,同时,中共还往往采用欺骗手法,用什么“服从大局”,“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党叫干的”并不是龌龊、邪恶的事情,即使是杀人放火,即使是自残自尽,也是为了“党的伟大事业”。

中共的“驯服工具论”的骗人之处在于,中共还同时肯定了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品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有人指出中共破坏了传统道德、造成全民道德大滑坡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解:中共好象也很重视道德建设啊,还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共产党员的修养”、“八荣八耻”等一系列的理论,发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孔繁森”等名目繁多的运动,这些现象怎么理解呢?

稍加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模糊了道德目标和处事态度之间的界线。如果一件事本身是好的,那么行为者本身的勤劳、忠诚、克己等态度会起到好的作用;反之,如果一件事本身是邪恶的,同样这些品质只会提高做恶的效率。一个勤勤恳恳的窃贼显然比懒懒散散的窃贼更可怕,谦虚好学、因而掌握了

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些人的初衷无疑是善良的。可是，中共掌握着全部的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垄断了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决定权。少数人改良的意愿和努力，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祸国殃民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如果把现在的中共政权比作一列正在冲向悬崖的火车，车上的乘客能通过整顿车厢秩序、打扫车厢卫生来避免车毁人亡的结果吗？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果不能扭转列车方向，就只剩离开列车这一条路了。

4. 党叫干啥就干啥

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的。这种判断需要以准确的资讯和普世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人之所以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的自主行为和判断能力。但在中共的宣传里，却时时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把这当成“党性强”、“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

在三、四十年前的疯狂的年代里，很多人满怀激情地响应：“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在中文里就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绝不能做的事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就取消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交给了中共。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听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们，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迫害自己的乡邻亲戚同事朋友，还是战天斗地破坏自然，或是检举告密，都一马当先，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

至此，中共从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情”（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求人们听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展到了要求人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中共主宰，完全沦为中共手里的工具。在中共近几年进行的“保先”运动，不仅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象中共那样对民众进行如此彻底的洗脑和奴役。

1) 党让人干什么

1967年夏，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上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这是《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一文记述的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惨状。这场发生在湖南道县农村的大屠杀，在两月有余的时间里，杀害所谓“四类分子”及家属四千余人，全地区杀人达九千以上。被杀者主要是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年纪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

十九年后，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关有志，在监狱中接受采访时，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50年当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

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也得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地一味掩盖，还不准别人去揭露。

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抓访民，甚至“六四”屠杀，有个说法，就是你到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看抓不抓你。中共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说是可以申请游行示威，但根本不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还要打击报复，更别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而在美国，民众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应的，美国警察常常会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传的那样，美国白宫前不容许抗议，要象中共一样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议者有过激行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来处理。

还有人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补贴金事件，一万多名失业的退伍军人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当时的胡佛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华府，驱散示威民众，造成两名退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美国公开出版的百科全书、记录片、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他们并不是死于美国军队，而是被华盛顿的警察误杀。不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们来看看美国朝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首先，美国政府遭到新闻媒体的无情鞭笞，《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报导了事件经过，胡佛总统也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的责任。在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民更是用选票把胡佛赶下台去。动用军队的教训之深，成为后来美国总统的前车之鉴。1971年在白宫附近发生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对前来请示的助手说：“让他们在那里好了。”对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没有对“六四”事件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说法，中国立法机构也没有提出过如何接受镇压民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的提案。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讽刺西方言论自由的例子，就是说你写篇文章，看西方报纸是不是给你发表，如果没有发表，那肯定证明言论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么一个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也就认为中共控制言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其实是中共给人们制造的歪理。报纸怎么可能来什么都给发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头几个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每个媒体都要做到“绝对公正”。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个体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对稿件和报导角度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媒体界要掩盖的什么秘密。言论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地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出格了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他的自由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既可以看反共的报纸，也可以看亲共的报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报纸，你也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去发表你的意见，这才是媒体自由的真谛。新闻自由最关键的尺度是权力者有多大权力控制资讯。在美国，政府常常处于媒体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动用权力制止，也无能为力。但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不想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动不动就给予封杀。把言论自由当作任何媒体都必须发表你的言论，根本就不现实。用西方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来否定言论自由，不过是为中共钳

制媒体找借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妙处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极力渗透、操控，并大肆发展自己的亲共媒体。

海外的民主选举出现的争端，也常常成为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说法，帮助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争和可能带来的动乱，民主的透明、媒体的监督和军队的独立毕竟是一种可借鉴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国家不管选举争端多厉害，国家很难陷入动乱和战争，这就是民主对社会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象个洪水猛兽。

俄罗斯和平演变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罗斯好起来，所以总是宣传俄罗斯如何如何惨。俄罗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国情”，问题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罗斯作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传的确是在误导民众。一些中国人到海外听到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时（2006年7月的报导），竟大吃一惊，觉得俄国人不是连饭都吃不上吗？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对象，是民主失败的经典样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增长率达7%，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较高，银行坏账率低于10%。印度的经济结构跟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我们无意为俄罗斯和印度说好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和发展变数，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报导而误导，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论调，按照中共的说法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在俄罗斯仍然是合法组织，如果俄国人民真喜欢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大选中把共产党选回去，人们不走这条路，显然共产党不受欢迎。

对于中国现在遇到的掠夺瓜分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也走过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们不去说这个原始积累的对和错，我们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积累之后，资本很快进入了再生产，同时有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诉求，参政，办媒体，搞教育，做慈善等，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积累就是捞钱，捞个没完，然后外逃，享乐，根本无意去影响政府和共产党，同西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怎么能指望出现“原始积累”后的良性循环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最彻底的类比：如果你去颠覆国家和政府，你看哪个国家不镇压你？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偷换概念的问题，很有迷惑性。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传灌输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现。“煽动和颠覆国家罪”是中共继过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这个罪名把普通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活动归到“煽动和颠覆国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被中共称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等等的许多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政府怎么会镇压呢？办报骂政府，在中国，这就是颠覆国家的“惊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颠覆国家根本无关，除非是囤积武器或者搞恐怖主义暴动。

对于一些少数极端宗教组织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乱作为，也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为中共的无神论开路的反面教材。而对世界上作为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带来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义，中共却尽力回避。很多

人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最邪恶的党徒。

稀里糊涂跟党走。中共靠暴力和谎言起家，不光骗了“敌人”、人民群众、国际社会，连“自己人”也一样骗。很多人就是被骗进中共，至今还陷在中共的谎言里不能自拔。这些人属于稀里糊涂跟党走类型，在中国为数不少。

无可奈何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性质有一定认识，也不想和中共同流合污，无奈进得去出不来，于是只好得过且过，对于中国现实，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态度。

以为没在跟党走。有些人以为看破了共产党的红尘，趁着共产党的政策暂时对自己有利，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捞够了就走之”的想法，不择手段拼命捞钱。他们协助中共短期内在橱窗城市造成了一个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繁华景象，这个景象既欺骗了西方，又欺骗了中国人。其实，这些人暂时能够捞一把的环境，正是中共刻意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贪婪、短视，一夜暴富之后一走了之的心态，也是中共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些人暂时给中共充当了样板，可是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障，中共随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变成阶下囚，因此他们活得没有丝毫安全感。这些人以为自己在耍弄中共，其实是在被中共耍弄。他们和中共联手制造的无解的社会难题最终会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

想让党跟自己走。有些人对中共有相当的认识，也有救国救民、澄清天下的志向，可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混入中共党内，试图一步步进入中共高层，从内部改良中共。很多人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些人在中共内部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被中共同化的过程，因为中共官场的“劣胜优败、逆向淘汰”机制不允许真正正直的政治家掌控“党”的走向，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被废黜是最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1959年到1962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肇因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跟党走”。曾希圣后来又在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数百万人，民愤极大，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所以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

曾希圣有一个副手，叫张凯帆，是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有140万人，而当时芜湖市也只有30万人。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老百姓。可是张被曾希圣抓起来，戴上手铐脚镣。毛泽东说张凯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判了20年。

对共产党员来讲，他们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一套邪恶机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人，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凯帆，恰恰是共产党要迫害的对象，因为张没有跟党走保持一致。而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人却没有关系，因为他跟党走保持一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不断这样去训练党员的党性，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要从人性良知出发。这样，在中共官场内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背上中共原罪包袱的过程。当他们自己也被染黑，其命运就和中共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这时想不跟党走，也身不由己了。

还有一部分人，企图跟党走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变历史轨迹。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决定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民众和一部分中共官员，最后迫使中共妥协，改变它的运行轨迹，

起宪法来。

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

第一，中共靠斗争起家，又靠斗争维持统治，“革命的绞肉机”一旦开启，就无法轻易停下来，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必然成为受害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中共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被挑动的团体，说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轻则随手一扔，重则打倒批臭，或者当作替罪羊杀掉以封悠悠众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终”是这些团体的宿命。有一个“作法自毙”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说，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主人将受惩罚。商鞅颁行的严刑峻法最终害了自己。中国人常说一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斗争机制反作用于斗争的发起者的现象。上文提到的两个片断，为这种现象增加了两个生动的例证。

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党的绝对权威，任何党员的利益、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利益，都要服从“党”的利益。因此其打击对象具有随机性，不光任何威胁或被中共认为威胁了其一党专政的个人或团体遭到整肃；即使没有敌人，每到一定的时间，中共也会制造出一个敌人，借以唤醒民众的恐怖记忆，从而巩固其权威。在随时可能被党定义成敌人的普遍恐惧中，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党的心思和动向，争取比“党”还“党”，让“党性”成为自己的唯一行动指南。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只是一具躯壳，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的精神和灵性。没有灵魂的肉体与动物无异。在努力和“党”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人们恰恰在扼杀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为敌。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存活到最后的胜利者，也一样是失败者，因为成功的是党性，而非他们自己的人性，他们真正的自己早已经死了。

第三，“跟党走”意味着认同了中共的斗争哲学，至少是客观上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无休止的党内党外斗争破坏了传统道德和人际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毁坏了所有人的生活环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场很惨，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宁静。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个人都要对别人猜疑防范，生活得很很累。在彼此争来斗去的过程中，人性恶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贪婪、自私、恶毒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个环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担党文化的后果。

3) 跟党走了几种类型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共产党了，再说，现在根本没人信共产党那一套。老百姓都在忙着奔小康，谁还在跟党走呢？现在人们对共产党，都是阳奉阴违，个别胆大的，还在考虑让共产党跟着他走呢，没准儿哪一天共产党真就脱胎换骨了。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就象没有兑现的支票，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可言。共产党并不怕你在酒桌上或日记里骂它，因为剥夺言论自由固然可以连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都一并剥夺，可是有了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却不意味着就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不进入公共空间的言论无法转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动，也就无法对现实施加有意义的影响。

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还在跟着“党”走的中国人，有几种类型。

明明白白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流氓邪教的老底一清二楚，但为了个人私利，顺着党的邪劲走，“党”也利用这些人的心黑手狠，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

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对信仰一概进行批判，排斥别人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这样似是而非的类比还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对于中共不利的东西，中共就不类比了，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和国情。“国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宝剑。其实，这不能学，那不能学就是因为触动了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而已。

4)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这是人们反驳别人批评的常用语。其实不对。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对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指手画脚一番，并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对方更会演戏，更会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欢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恶行狡辩。当美国批评中共人权问题时，中共的回应就是美国的人权也有问题，而且也要出一本指责美国的人权报告，从而认为自己的人权问题就无所谓了。而中共出的美国人权报告，其内容都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和美国政府关注的案例，中共为什么要劳民伤财去多此一举呢？就是为了出一口“气”，非为改善美国人权（实际是希望美国人权丑闻越多越好，方便中共做文章），实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权罪行强词夺理。

中共为自己狡辩，那是它坏到那个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说辞，甚至认为中共的回应理由是多么“为国争了光”，这就是糊涂了。且不管美国的人权怎么样，美国批评中共的人权，客观上是帮助中国人民，因为在中共的人权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吗？别人呼吁中共改善人权，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受惠吗？遗憾的是，因为党文化的影响，认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全体中国人民，触及了被中共灌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尊心，结果盲目维护中共的面子。有人为中共找理由，说别人批评中共的后面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权要挟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们不买中共的托辞，坚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么，中共改善自己的行为后，别人不就没有办法要挟了吗？这样，既为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利益，又打击了别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举两得，不是更明智吗？

所以，正常的思维是，不管对方做得怎么样，只要指出的是事实，就应该听取并改正。有人说“正人要先正己”。这又是一种误解。这话应该是批评者自我勉励的话，那是批评者境界高，为了更有说服力，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不能作为被批评者抵触别人意见的理由，不是有句话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在外国元首要跟中共谈论人权问题时，有一个很典型的被认为是“机智”的回答，就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们说中国人权，因为一百多年前你们严重侵犯过中国人民的人权”。在说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坏自然，污染环境时，也有个类似的说法，就是“西方强国不也转移污染工业，甚至把废料运到别国吗？”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国家曾经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为什么共产党就不可以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呢？西方国家能够污染中国，共产党怎么就不能污染中国呢？

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听取国际社会的意见，除了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还要研究先进的制度。为了化解国际社会在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压力，中共总是用“说我没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来无理取闹，

误导民众，受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5) “对共产党要一分为二”

共产党自知坏事干绝，所以，希望人们能对它一分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着说，“难道共产党一点好事也没干？”这种观点听起来好象有道理，但是这要看一分为二的场合和目的是什么。

一个杀人犯，杀人偿命，按照法律来说，就已经可以给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一分为二，想用小时候曾经帮助老大爷推过车，植过树什么之类的来抵消杀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国家和政党来进行类比的话，可以看一下二战以前的德国。1933 年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他的经济政策使德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以 100%的速度增长，德国的失业率从 30%降到 0%，德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在一战以后德国是战败国，英法列强对德国是很歧视的，要收它的赔款，但是希特勒当了元首之后，德国成了欧洲的强国，特别是 1936 年成功地在柏林举办了奥运会，使得很多国家对它刮目相看。当时德国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战斗机的，很多地铁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时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当时说要让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这就是德国“大众”车牌的由来。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经济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军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说他是军事家或是经济学家，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全球九千万人的伤亡，造成了四千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他在集中营里面对犹太人残酷的屠杀，有六百万犹太人因为二战在集中营里失去生命。这些事情就足以给希特勒和纳粹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国去的话，没有人说我们要对希特勒和纳粹进行一分为二，而且包括现在拥有纳粹的标志，或者对希特勒崇拜都是违法的。

我们再拿日本人打一个比方。侵华日军在中国除了杀人，它还办了很多实业。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它开工厂，开矿业，一直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当时东北三省的老工业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当时东北三省作为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在中国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动，比方说盂兰盆会，到南京秦淮河两岸看一看那也是属于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饮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不要感谢侵华日军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呢？也要来个一分为二呢？我们好象没有人这样想，因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杀，有七三一部队，有三光政策，而且这场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两千万军民的伤亡，就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给侵略战争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产党这儿，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共造成了中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万人是被它屠杀掉的，四千万人是活活被饿死的，这个屠杀的数量超过纳粹德国法西斯的十几倍，超过日本人四倍，另外一方面，共产党又出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就这两件事情本身，就足够给共产党定性了。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共产党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分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绝了。比如它在镇反的时候，为什么不对原来国民党的官兵一分为二呢？在迫害刘少奇、打倒林彪邓小平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不对他们一分为二呢？今天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怎么一句好话都没听说，全部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呢？所以从它的表现来讲，它所谓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为它维持统治所找的一

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制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 57 年最先倒霉的右派分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民主党派的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教育家蒋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汉、丁玲、赵树理、罗广斌、康濯、杨沫，学者杨献珍、翦伯赞、吕振羽、梁思成，演艺界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尚小云、严凤英等均遭迫害。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早就经过思想改造，对共产党宣誓效忠，并且已经为中共政权作了巨大贡献，仍然被迫害得死的死、残的残，少数幸存下来，但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痛。

1956 年 11 月，文化部和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辞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继续游斗。其时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几次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武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舍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 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 年 8 月 23 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艺术家句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八九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净谏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 月 23 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把污损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

在共产党导演的这一出人间闹剧中间，有两个片断意味十分深长。

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为求自保，拼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 年 10 月 11 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另一位作家上台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要维护“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

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

到了现在，“永远跟党走”还是中共的“主题教育”，通过所谓读书读报活动、革命题材影片展映月、“聆听红色经典”系列活动、大中学生“三个代表”学习宣传实践团活动、举办主题论坛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时，央视搞专题文艺晚会——《永远跟您走》，各地上至机关院校，下至街道乡村纷纷仿效，类似演出大批出笼。

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厢情愿地处处宣传“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口号，而且还坚决表示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中共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欲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2) 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

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它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

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四十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地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

个借口，让大家对它有一定程度的认同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如果真要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中共就应该面对过去，面对错误。中共说的“一分为二”其实是一个障眼法。它先虚晃一枪，说事情总有好有坏吧，让人觉得很“客观”的样子，然后，话锋一转，“坏”就不说了，落脚点却是“好”。所以，中共是不让人们去彻底全面地反思中共的过去的，它干的坏事是不让人说的，要说也只能按它的调子和分寸来说，这样说的后果反而是给今天的中共贴金。德国总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忏悔对犹太人的罪行，而中共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向全国人民忏悔。如果在德国的格言现在是“千万不要忘记”，而在中国则是“千万不要记住”。可是，忘记历史的社会能够自救吗？

6) “温饱权高于人权”

面对世界民主潮流，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恶行成为中共在世界上的一大包袱。于是，御用文人们杜撰出了一个人权歪理，“温饱权高于人权”，“你到饥肠辘辘的农民那里去问问，他们是要饭吃还是要民主自由？”很多人面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共的人权记录时，也会用中共这一套话语进行批驳。在中共的政治教科书和每年的政治考题中，对这个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中共在不同的外交场合，也经常俨然理直气壮，一副义正词严的样子。人们重复这句口号，跟中共的宣传和灌输是分不开的。

其实，这是一种混淆逻辑的诡辩，它把民主自由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把这个抽象的东西去同具体的“食物”进行对比，加上暗示农民的教育水平低，只会要具体的，而不懂得抽象的东西，从而得出农民都“要饭吃”，于是，就否定了民主自由的重要，结论就是“温饱权高于人权”。

我们稍稍换一个说法，把民主自由具体化，农民们就不会上中共的文字游戏的当了。过重的负担，压得农民翻不过身，就连中共自己都承认减免农民负担是一项关系国家的大事。对饥肠辘辘的农民，如果把“民主人权”的抽象字眼转换成具体的行为，我们可以这么问，“我们农民被整得苦啊，找人把你们的情况反映出去，你们愿不愿意？”“当官的欺压农民，苛捐杂税多啊，咱们把那个坏蛋乡支书罢了，选个真正为我们干点实事的，大伙乐意不乐意？”对于这样的提议，农民们难道会拒绝？

人的肚子饿了，要想得到帮助的话，首先就要发出声音，让人知道你的肚子饿了。就是说“言论权”比“温饱权”更紧要。可是，为什么中共颠倒顺序的狡辩人们也能欣然接受，听之任之呢？就算吃不饱的人没权说话，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已经吃饱了吗？为什么不让他们说，或者容许他们替吃不饱的说呢？

其实，“温饱权”对于中共来说也不重要，中共在意的只是一个敷衍外界、抵触言论自由的借口。

类似上面这样的似是而非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之后，的确使得人们沟通起来都很困难，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另一个问题冒出来。如何避免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避免用党教会的话语说话，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把角色分开。把自己同党分开，克服党妈妈情结，突破“离不开党”的底线，不把党的无神论、唯物论和斗争哲学、仇恨哲学当作自己思想的基础。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看一看如果你附和那些观点，到底对谁有利，是鼓励党干坏事还是监督党、抑制党不使它干坏事。中共可以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们老百姓不能跟着起哄。别人批评中共的时候，并不是在骂中国人。丢中共的

面子，不等于丢中国人民的面子。能够挑战独裁，为真相挺身而出，是真正的勇士，是会赢得世人的尊敬的，这种尊敬是对中国人民的尊敬。

2. 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无神论是党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们思想，就在于切断了民族传统文化，用马列主义外来文化替代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半神文化，从此“无神论”主宰大陆，敬天畏神、善恶有报变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就人类历史而言，对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人类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也只能是有名无实。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相信今生来世，不相信做坏事有报应，于是，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漠视生命 肆意杀人

1949年以后，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在历次运动中，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运动历来是煽动群众斗群众。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么帽子，然后众多乡邻、亲戚甚至家里人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骗的一面，但他们之所以能做得出这些恶行，却跟党文化的洗脑紧密相关。一个相信天理，相信人伦人性的社会，不可能大面积干出这种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

“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饿死的大约有四千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当饥荒发生的时候，能够开放粮仓，能够寻求解决办法，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至于那么高。更令人震惊的是，面对饿得奄奄一息的村民，中共干部却命令军人强行封锁道路，目睹他们活活饿死也不准他们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抢”，学生居然用皮带抽死老师，孩子用砖头砸死父亲。还有人把对方打死之后，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国古代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本身已经够可怜了。但现在很多人却不但不见死不救，还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杀人为乐，只要中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是党性的需要，是党的政策的需要，什么后果都可以不顾。中共思想改造的后果之可怕，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维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因为中共的腐败与暴政，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被压迫团体。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权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而下岗工人却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贫穷人家的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学费而上吊自杀……但面对下层民众的凄惨生活，很多人已经漠不关心，毫不在意。面对可怜无助的上访民众，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可以大打出手，将人致伤致残，丝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谓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对无数的矿难，说出“谁叫你生在中国”这样的狠话来。而中共将官朱成虎，则放话可以牺牲西安以东地区、不惜中国一半的人口来打一场核战争，跟老毛的“中国死了三亿，还有三亿”的说法如出一辙。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大学生孙志刚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大量法轮功学员惨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来法

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

同时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

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象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象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浜》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

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一千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六百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万个相关词条。

女作家丁玲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 1951 年“斯大林文学奖金”，在 1949 年以后的文坛上风光一时。这位 1932 年加入中共、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软禁过三年的丁玲，被她无限忠于一党的“党”流放、监禁二十年，其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可是，“党不爱她她爱党”，“平反”后，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说自己仍然“象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1984 年、去世两年以前，丁玲致信中共中央：“五十多年来，我得到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彼时的丁玲，年近八十，生命的四分之一在中共的囚笼里度过，目睹了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和残酷无情，仍然“象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那些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目睹了中共的专制机器“横扫”、“捣毁”、“砸烂”、“打碎”的野蛮力量，被中共吓掉了魂，即便在自己家里也不敢大声说话、身在海外也不敢看一眼中共定义的“反动读物”的可怜的中国同胞，当他们说出或者哼唱出“爹亲娘亲没有党亲”、“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正是罹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扭曲心灵的呻吟。上面分析的三种情况——受中共蒙骗、执著自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能使人“自发”地喊出中共让他们喊的口号。此外，今天数量更多的人经过中共长期训练，能毫不费力地拿出两副面孔，换上两种腔调。他们用一副面孔、一套腔调用来应付中共官员、会议表态和思想汇报，另一副留给茶余饭后和家人朋友之间。前几年大陆流行的顺口溜，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为什么听老婆的话呢？因为人们心里都知道，亲人（朋友）的关心是真心的；“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过人的死活，可不表态又不行，所以只好喊几句口号，敷衍一下，也就是所谓“认真真走过场”。

3.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它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它、跟随它、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

1) 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

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考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走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

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中共官员和医生从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灭，骇人听闻。

漠视生命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运动当中，也不只体现在权势者对百姓的态度上，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充满好勇斗狠，肆意残杀的现象。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砍啊，杀啊，对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残忍的校园凶杀案也屡屡发生。社会上谋财害命、用钱买命的事情随处可见。官员、富豪雇凶杀人，有时连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当人的道德沦丧到如此穷凶极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

战天斗地 破坏自然

几十年来，党文化把中国人民塑造成“无法无天”、“战天斗地”的一族，从当初的“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疯狂地打麻雀”、“乱砍滥伐”到今天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只管眼前，无视子孙后代的福祉，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 7 倍、美国的 6 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 2 倍。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 10 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 6 个。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 38%，18 个省（区）的 471 个县，近 4 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 1.5 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6 年 8 月 26 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 2 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 GDP 当中，有 18% 的 GDP 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覆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许多网友面对祖国母亲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不觉“万念俱灰”。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曾是中共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打歌曲，有考证指出，这条美丽的大河就是承载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有道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淮河污染之触目惊心，让这句民谣成为历史。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农村水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约 60% 为劣五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响 1.3 亿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没有用的。2004 年 7 月 20 日至 27 日，淮河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有如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 133 公里，总量超过 5 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顺者昌，逆者亡，满河黑暗，浮尸（鱼虾蟹）千里。“10 年治污水质回到‘原点’，600 亿付诸东流。”

党文化带给中国人的“不计后果”的心态，更是表现在热衷于搞大运动、大项目，劳民伤财，不顾自然规律。再大的工程，总是先上马再说，哪管什么后果，满足战天斗地、好大喜功的变态心理，走一步看一步，出了事算“交学费”，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当作儿戏。

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如此重大的项目中，决策人员也仍然以政治为决策依据。“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关于三峡工程，该不该修，人们听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

负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应付”对策，而反对一方的专家们的进一步反驳和详细讨论，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动就得有坡度，库区的头尾就要有落差，淹没区就必须是一条斜线。但是三峡工程“移民组”为了迎合当局缩减移民搬迁费用，提出的三峡移民淹没线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坝蓄水到预定的 175 米，另一头的重庆的淹没线也是 175 米。但是按三峡工程泥沙组公布的万分之零点七的水力坡度来计算，600 多公里以外的重庆的水位高度将不是现在说的 175 米，而是超过海拔 217 米，到时就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了。如果要保重庆，水位就不能蓄到 175 米，那当初的防洪发电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这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这么严肃的后果就不当回事？还有，三峡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发电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浑蓄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等等。大坝防洪就要保持低水位准备蓄洪，水位降低又会导致发电和航运能力下降。2000 年 5 月 17 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对三峡委办公室主任建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 10 米。但低水位必然影响到航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发电，为此张光斗主张修建燃油、燃气或燃煤的火电厂进行调峰，张一再叮嘱“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处理泥沙淤积是水库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而 200 公里长的三峡是沙石最好的避风港，三峡水库拟采用“蓄清排混”的运行方式。海外有学者预言“排混”只对大坝前很短距离有效，而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则斩钉截铁地说一块石头也出不去！黄教授 1957 年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关于三峡工程，黄教授写过三封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 30 分钟的时间，把三峡工程问题给他们讲清楚，说服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 30 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得到。

“南水北调”是继“三峡工程”之后又一项世界级工程，主要目标是将长江水分东线、中线、西线调往严重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东线、中线工程已于 2002 年底开工；西线工程计划于 2010 年开工。当初“三峡工程”还象征性地有个全国人大无记名投票，而现在人们连那个过场都嫌碍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设计者们竟然说，中央宣布东线、中线开工，就意味着西线也开工了。早在 2001 年 7 月就通过水利部专家委员会审查的“西线工程纲要”，到 2005 年 3 月才让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调水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人文科学家等才第一次看到其“庐山真面目”，让这些第一线的专家们十分忧心。西线工程要在源头上把长江水引到黄河，而黄河比长江高出 200 米，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难多少倍，风险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专家感叹“西线工程令人担忧，会不会救了黄河毁了长江，甚至救不了黄河还毁了长江？”呼吁中共“告别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话在以政治决策为中心的中共那里，又能传多远呢？极力支持工程上马的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对外界质询的回答是“随着项目推进，一切都会逐渐明了”。被中共的“战天斗地”洗脑过的人们，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动土，态度居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来没有让人去和地斗，破坏自然。在传统观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抗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要

理想追求的结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对共产党的罪恶视而不见或者刻意缩小。他们没有想到，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往往是背离的；更重要的是，党员个体的动机绝不等于中共这个整体的动机，党员的个体行为也不等于中共的整体行为，而后者才是判断中共这个组织的性质的依据。

我们无意指责谁。中共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组织，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其邪恶和伪善，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和想象。共产党在中国崛起的时候，又是中国国力跌至低谷、内忧外患相煎迫的危机时刻，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冷静思考，理智判断，实属不易。几十年后的今天，被欺骗了半辈子甚至更长时间的人，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共的本来面目，要适应这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彻底反思自己的生平 and 事业，尤其需要不同寻常的诚实和巨大的道德勇气。

（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 年 8 月 23 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他们一边狂扫乱射，一边说“Party（聚会）开始了”。两名劫匪绑架了三男一女四个职员。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 28 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人质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他们，而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更加使人惊讶的是，几名人质获救以后，不但不控诉劫匪，反而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的不杀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质和劫匪之一订了婚，另外一位人质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这几名人质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并且这种认同持续到威胁解除以后。这种精神病症后来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让人切实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他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加害于他；第二个条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们生命的救主；第三个条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环境，使他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让他得到的信息；第四个条件是让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

不难发现，中共具备了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所有条件。中共对中国人异常成功的洗脑，其机制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锄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作家刘白羽回忆道，他经过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所谓“平实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忘记了自己健康时的状态。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恩威并施，拉一派、打一派，每个党员都希望自己被“党”信任，被“党”当成自己人而不是敌人、“斗争的依赖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

中共的另一个惯用伎俩是“进十步，退一步”，每次运动之后都声称“扩大化了”，于是开始“甄别”、“改正”、“平反”，在运动中没有侥幸过关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平反，面对突然而来的一点儿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宠若惊，为此对“组织”上感激涕零。

次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的心态。我们不怀疑这种情感的真实性，这里想分析一下，这些被共产党一再耍弄、残酷镇压，在监狱、劳教所、农村和边疆流放地蹉跎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甚至被共产党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中共虚伪的“忏悔”呢？

中共宣传“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真实含义是要人们最终信赖、跟随“比爹娘还亲”的中共。然而推崇孝道的中国人一直把乱认父母看成是奇耻大辱，“认贼作父”是骂人最重的一句话之一。可为什么中共治下众多的中国人却默认了八十岁的中共把自己比作五千岁的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重点分析的三个主要原因，一个跟中共的欺骗宣传有关，另外两个跟被骗者的心理有关。

（1）真假两个共产党

共产党一贯善于祭起“道德”的大旗，但那些道德口号的内涵完全是以服务中共为终极目标的。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要服务党所定义的人民，对党所定义的敌人却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要“大公无私”是把心窝窝都交给党；“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重点是要学他鲜明的阶级立场和象螺丝钉一样对党的忠诚；“五讲四美三热爱”离不开“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心灵美”一定要美在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占领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德”的最高境界；“和谐社会”强调的是和党保持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党所喜欢的人的和谐；“八荣八耻”是以党的喜恶来划分何为荣何为耻。正是由于中共的道德运动都是以服务共产党为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对推动道德教化根本没有用处，只是运动一阵风，反而造成中国社会道德的日益堕落，道德危机现已成为中国公认的社会危机。但是，在客观上这些“道德运动”会给中共披上一层“道德”外衣来迷惑民众，同时，中共一贯把历史上它所犯的一切错误都归结到少数替罪羊身上，喉舌宣传更把中共描绘成“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化身。那么这样长期下来，无论民众在历史上吃过多少共产党的苦头，还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树立一个假象共产党，以为这个“假象”才是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因而即便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和委屈，仍然用善意揣度中共，认为“党”的出发点是好的。

（2）拒绝承认自己被骗

大凡受骗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因为承认受骗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年的幼稚、轻信、没有经验、不懂世故。很多年青人曾经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以为它真是“一心为民族”，于是或者加入中共，或者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对它抱着一种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在中共的“事业”中，他们付出了大量心血、投注了很多感情。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纯真理想被中共无情地戏弄了。中共内部的倾轧和堕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剥削阶级”政权，而中共政权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灾难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敌入侵。这时候，他们本该翻然悔悟，反思自己认识上的误区和人格上的弱点，反思自己何以被中共利用，充当了它祸乱中华的工具，并进而采取行动，揭露它、抵制它，或者至少脱离它，不再继续为虎作伥。

可是，护短、好面子、强烈的执著自我，这些心理上的弱点妨碍了他们清醒地做出如上选择。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否定了共产党就好象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当初是抱着一腔热忱和良好愿望“参加革命”的。为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

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它使得中国拥有过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现在发生了生态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正是因为这种不计后果的做事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青山不再，绿水断流。特别是现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们，更是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去干。当大自然报复的时候，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

世风日下 不讲道德

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也日渐低下。看医生要递红包，孩子入学要交红包，打官司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把一切固有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

就说造假的程度，从假烟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么都有。2003年安徽阜阳发生了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长期食用这种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就有171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13人。许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费掉了所有积蓄，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2006年，北京市粮食局所把2300多吨陈化毒米流入市场，里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包括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黄曲霉素。然而商家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进入市场波及全国，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广东、辽宁、四川、湖南都出现数以吨计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掺好米，百姓无从分辨。

过去叫盗亦有道，掺假骗钱，也就骗个钱，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们，除了少数心里还遵从传统道德约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觉得道德、良心能值几分钱？中共的无神论、唯物论、不讲天理，不讲道德，教育出来的就是这种为了钱，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无独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报》报导，有些当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这样的校训和规章，是让人民放心还是更担心。

当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游戏规则，社会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媒体监督和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经比较完备地建立，民众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程度，国民心态比较平稳时，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会是在规则之内，道德和法律在原则上有个约束。而中国是规则还没有确立，就先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线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性泛滥造成社会危机

时下的中国，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区，相反，“性生活”却成为开放最彻底的。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白领阶层的换妻游戏、婚前同居、网婚、闪婚、隐婚、成人用品商店、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电视电影节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体的独领风骚等等，谈政治色变的中国社会，人称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

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 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 6 千，1999 年达 45 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 1%还是 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 10%。在这股席卷全民的“黄潮”中，不但是青年一代意识领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过去被“耽误”的时光。电影《手机》和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折射。忆往昔“全国上下一片红”，看今朝“全国上下一片黄”。

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时尚”，不但并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在 1999 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 102 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 107 个。

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势人物到平头百姓，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条件，就都想着占上一把性便宜。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教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处处可见，天理、人伦都可以不管。

就连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也频频出现禽兽教师。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国内媒体 2003 年报导，重庆大足县一名小学教师，从 2002 年至 2003 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 10 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以帮学生走后门上学为名，将该校 12 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两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仰小学一名 51 岁的教师在一年半时间里 42 次强奸 12 名女学生、35 次猥亵 16 名女学生，仅有 3 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 年 6 月，临夏县一小学教师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将三年级的 9 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数最多者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 15 岁，其他均是 9 到 10 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 3 个多月竟然作案 7 次，共强奸 11 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仅 10 岁……这样丧心病狂、触目惊心的恶行，在今天却已经屡见不鲜。

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自古都是严肃认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结婚之后才能住在一起。结婚时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为自己的婚姻作证。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乱，那会是一项大罪。强奸就更是跟杀人放火一样，罪不可赦。“万恶淫为首”，但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先辈的古训。这种局面，不能不说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价值，宣传无神论、唯物论密切相关。在中共的党文化里，权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诠释者。只要有权，只要有条件，就可以肆意妄为。从共产党早年的“共产共妻”，到毛泽东的淫乱，再到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堕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传统价值都被颠覆了，一切家庭人伦观念被抛弃了。但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乱性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再发展下去，我们到底期望一个怎样的未来？

黄赌毒产业化 官方成保护伞

中国卖淫业一直是非法的，性产业必须同军警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有些性产业根本就是同军警合作办的，有的也不隐瞒这点，因为这是提供安全的保证，例如军队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 1000 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 1 万亿人民币。由于 2000 年的警察行动，中国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费降低，中国

温暖”，网络上天天头条的“反腐败”决心，领导“抗洪斗争胜利”，抗击“非典”成功等等，都是利用把百姓的苦难化为中共自己头上的光环。《焦点访谈》中每天都提到社会阴暗面和种种不公之处，在曝光之后，在人们发泄了对社会现实不满之后，收拾局面的一定还是党和政府的“各级有关部门”。宣传中报喜不报忧更加熟练，不管事情多坏，问题最后都能归结在“只要踏踏实实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问题一定会解决”。这些宣传的主题就是党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愿意关心解决中国人生活中各种问题，爹娘都没有这样的本事，真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2) 灌输党妈妈情结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学文化……”

这两首歌，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耳熟能详。中共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这种拟人化的宣传手法呢？

因为母亲是一个神圣的让人充满情感的称呼。母亲生养了我们，对我们有恩；母亲疼爱着我们，对我们有情。年轻时，我们依赖母亲。成年后，我们孝顺母亲，供养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传统社会讲究孝道，即使是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将相，也对自己的母亲非常敬重。

共产党利用这种心理，把自己装扮成母亲，以此骗取中国人的依赖、顺从和供奉。几十年宣传下来，很多人真的把共产党当成一家人了。共产党干了坏事以后，人们乐于相信“党妈妈”的初衷是好的，或者方式不对头，或者被个别人利用了，总之“党”没错，“党”错了也情有可原。

还有一个与党妈妈情结相关的观念，那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如果谁把共产党对中国百姓干的坏事揭露出来，尤其是向国际社会揭露出来，就是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爱国人士”们就觉得象是自己被揭露了一样，就会起来口诛笔伐。

且不说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母亲。就假设它是母亲，如果一个母亲操起了菜刀来对待孩子，邻居不但该管，还应该把警察叫来呢。可见，就算退一万步说，中共是好心做了坏事，人民也应该予以揭露，用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它不敢继续为恶。

另一方面，随着更多的史实和内幕被披露，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的杀人、腐败、欺骗和对中国百姓的残酷镇压，是其公开宣扬的理论原则和一以贯之的政策方针。从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都决不是共产党的“失误”，而是它严密策划、系统实施的统治权术的一部分。由此观之，中共决不是比爹妈还亲的亲人，而是一个披着“好人”、“亲人”外衣的强盗和流氓。

3) 认贼作父的心理原因

八十年代初流行一时的电影《牧马人》的主人公许灵均被打成右派，流放内蒙古二十年。早年移居美国的父亲回国看望他，邀请他去美国生活，可是被他委婉、但坚决地拒绝了。理由是：自己和千百万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母亲错怪了孩子”。孩子是不会埋怨母亲的，因为母亲爱孩子，希望孩子好，尽管有时方法不对头。

许灵均的想法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母亲打孩子”、“母亲错怪了孩子”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段时间文艺作品里经常用到的比喻，也是很多从中共历

我们不妨剖析一下，“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这句口号，共产党是怎么说的，又是怎样达到其宣传目的的。

1) 宣传中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几乎所有的“革命”电影里边，都有这样的镜头：英雄人物身负重伤，咽气前还要在怀里掏半天，嘱咐身边的人替他交最后一次党费或者递入党申请书。类似的情节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目的是强化一个主题“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正常人弥留之际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妻儿，但是党文化的宣传中，人临死前想的不是亲情，而是比爹娘还亲的“党”，要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交给党才能闭目。

和军队有关的作品中，往往有指导员和政委如何关心士兵，嘘寒问暖，照顾家庭中的困难等等细节，最后通过士兵的口说出部队是个“大家庭”、大熔炉，自己在“大家庭”中“成长”、“进步”，“大家庭”的爹娘自然就是“党组织”。反映地方生活的，好事常常是“优秀党员”做的，党委书记关心生活、结婚、家庭、分房子、生孩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最后都得“老支书”来“主持大局”，来摆平。潜移默化灌输有事找组织，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思维方式，把人的下意识引导到“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主题上。

还有许多旋律优美的歌曲，贯穿其中的也是或明或暗的主题“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当人们唱起这首民族气息浓郁的歌曲之时，头脑中浮现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景。但这只是一个引子，歌曲在最后一句归结到真正的主题：“毛主席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因为旋律优美甚至让许多成年人回味无穷。“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当人们沉浸于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之后，看似不经意的一句歌词点明了主题：“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哪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父母安排的？这意味深长的一问力图揭示的显然是更深一层的主题：“比父母还亲的党安排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中共宣传中非常喜欢树典型模范，当然这些做好事的模范人物都是党、团员。任何社会中都有心地善良、先人后己的好人。但中共善于把好人拉入“党组织”，也善于利用宣传手法从党员中“挖掘好人好事”，把他们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作用下做的关心百姓疾苦的事情宣传、放大，说是因为入了共产党，党性起了作用；能做这些好事，是因为有党的培养教育；“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等等。还要让被党“关心”的人表态：“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时时刻刻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宣传中鼓吹这些行为都暗示人们，只有共产党员才真正关心你，这种付出超过你的父母，还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中共攫取垄断了社会资源的方方面面，人们上学、工作、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得在这个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中进行。于是中共在宣传中混淆人们的概念，把正常社会中人天经地义应该具有的生活环境都说成是“党”或“政府”给的福利，让人们忘记了自己是父母生的，钱是自己劳动付出挣来的，造成混淆是非的党文化思维。比如说：“没有我们党，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呀！”“还是党的富民政策好”“改革春风吹满地”。有点好处，生活提高，都是党给的，从中彰显的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宣传中，不光是歌功颂德，不好的方面比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乱象、自然灾害等等都可以被中共拿来作文章，如电视中“扶贫”、“领导下乡”、“送

GDP 因而减少了 1%。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王增先在研究会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将近 6000 亿元人民币的赌资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毒品市场 3000 多亿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 1 千万。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原局长曲月福和现局长张保华及另外 100 多名警官为毒贩做保护伞，毒贩和警察勾结，贩毒“一条龙”。黄赌毒三大市场几乎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由于从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与背景，因此，中国的军警及政府要员成为三大行业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没有政府及军警做背景这三大行业在中国寸步难行。官方参黄参毒参赌，上行下效，造成中国人对吸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司空见惯，甚至亲身参与，不觉得自己干坏事。

在感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生活时，人们最有切肤之痛的就是社会道德下滑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形容共产党过去在课本里宣传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今天早已变成了社会实践中的“权欲、钱欲和性欲”全面崛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权，玩钱，玩女人）”。假货盛行，色情泛滥，黑社会活跃，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而民间疾苦却乏人问津，社会公正更是不得伸张。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内在的道德约束，没有外在的舆论约束，没有外在的法律约束，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3. 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谎言，满嘴脏话，行为低下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规范。

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惜，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把“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得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的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得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也不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使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的心灵上的超越、人格上的升华之“道”，把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羞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谎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张嘴就是谎言

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谎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之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谎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处处都充斥着谎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也学会了谎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得陪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

“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骗骗到国务院。”一路说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象说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谎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谎言来欺骗别人，家庭成了编谎和拆谎的战场。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许多经典谎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谎言。电影的编导有句话：“有很多时候谎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讲信，都认为撒谎是不对的。孔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用的话，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

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是第一性的，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谎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说谎，人们说谎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说谎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言，而且说谎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么说怎么做能够圆谎了。

还有人把撒谎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或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惟有信义才能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里，时间一长寸步难行。

党文化让人说谎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 660 多万元，无期徒刑），“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 5 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 160 万人口的贫困问题”（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 1800 多万元，死缓），“想到广西还有 700 万人没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 2000 多万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也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

人人张嘴就说谎，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也已经变成了人

倾一国之力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将天文数字般的国家财力用于迫害无辜的主流民众。

摧毁道德

人们对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黄赌毒流行、假货流行、诚信危机等等道德大滑坡的表现已经很熟悉了。还有一种道德堕落的表现形式，比较隐蔽，但危害更大。那就是：连道德标准都一并下滑了，人们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还觉得自己满不错的。其实，中国社会已经滑到道德崩溃的临界点了。

这种状况恰恰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中共给人民灌输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观念，批判有神论和一切正统思想，从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体系。共产党认为，道德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归根结底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否定了普世的道德准则。中共虽然高喊“法治”，让人们误以为目前的种种情形，是法制不健全造成的。但法治的基础是道德，对于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人，有法可以不依；中共凌驾在法律之上，不但带头破坏法律的实施，而且专门制订恶法迫害善良百姓。中共把撒谎用制度固定下来，官员们说一套，做一套，否则根本没法在官场上混。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领神会，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你黑我比你更黑，社会风气一日千里地迅速下滑。

《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迷信武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道德人心对于长治久安的作用，面对人性恶在今天中国社会极度复杂的表现，它根本就无计可施了。如果说在历史上，外敌入侵曾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今天，中共造成的人心全面失控的现实，则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更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危机。

毁灭文化

共产党三教齐灭，用简化字腰斩中华文化，疯狂破坏文物，迫害知识分子；文革后，传统文化基本被糟蹋完了，于是拿出一部分表面文化装门面赚钱。对此《九评》之六和本书第一、二部分已多有论列，此不赘。

中国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敌侵略。如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超过 2000 万中国军民的死亡，60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可是中共这个声称“为人民服务”的党，这个自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刻伤害，却远远地超过了日本军国主义，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族入侵造成的伤害。

很多中国人一方面以中华民族的正统自居，在外国人面前尽量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共产党的形象，不允许别人稍加批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摧残中华文化的元凶，正是这个战天斗地、嗜血贪财、卖国败家、恶贯满盈的共产党。他们如果真的爱国，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拒绝和中共为伍。没有共产党，才会有新中国。

2.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这句口号，已经显得可笑了。中共如今很少直接宣传这句口号，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这种赤裸裸的灌输反感，还是因为通过长期或明或暗的宣传，人们已经接受了这句口号背后的内涵。比如当人们心目中已经不自觉地把中共等同于祖国的时候，中共只要宣传爱国主义，歌唱“长江之歌”，就可以让人下意识地想到“党”。“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宣传，仍然深深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维。

缩小了的，所以实际数字只会比这更多，不会更少。

有人说，中共被迫杀人。这种说法不值一驳。中共建政之初，经过连年战争，中国百姓人心思定，对新政权充满希望。中共完全可以大赦天下，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和各项法律，并大力发展经济。可是中共大开杀戒，发动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凭借杀人造成的恐怖，一举建立独裁制度，民主党派迅速沦为政治花瓶。

还有人说，中共为了理想杀人——毛泽东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付出一定的代价情有可原。这种说法更荒谬，希特勒、东条英机杀人难道不也是为了他们所谓的“理想”吗？

也有人说，这些都过去了，中共不是不杀人了吗？不，中共从来没有停止杀人，只不过过去是大张旗鼓的杀，现在是偷偷摸摸的杀。以前杀人的目的是制造恐怖、从而维护其独裁权力；现在则把杀人变成复杂的产业，比如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卖给中外病人，牟取高额利润。

掠夺、糟蹋财富

现在的中共把每年 8% 的 GDP 增长速度作为它执政合法性的依据。少数城市依靠特殊政策和引进外资，造成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繁华景象。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大城市移向农村、从沿海移向内地、从既得利益阶层移向城市平民和占中国人口 80% 的农民，就会发现，贫穷——触目惊心的贫穷——仍然是中国的可怕现实。

中国决不是从来就这么穷的。直到清代中叶以前，中国经济都在世界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清朝乾隆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51%，远远高于现在的比重（4%）。虽然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创造了 25% 的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的财富到底哪里去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的掠夺和糟蹋的结果。中共建政以后，通过工商业改造和人民公社化，把民间财富在几年时间内集中在中共权力阶层手里，美其名曰“公有制”。巧取豪夺，莫此为甚。

不仅如此。几十年来，因为中共极端愚昧的政策和各级干部的浪费和侵吞，糟蹋了大量的国民财富，彻底搞穷了我们的国家。例如中共建政伊始发动所谓“抗美援朝”，总花费高达 500—600 亿美元，当时的一半国民收入用于朝鲜战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跃进”，不光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而且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200 亿元（以当时的价格计算，以下同）；十年文革导致中国经济损失至少达 5000 亿元（这还不算无数的珍贵书籍文物损失和思想禁锢造成的巨大后效应，以及整个社会道德和法律秩序崩溃，一千万户家庭被抄，两千万人被批斗、毒打，数十万人被逼自杀等难以衡量的间接损失），超过 1949—1979 三十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以毛的“世界大战早打比晚打好”为指导思想的工业大转移——“三线工程”造成经济损失 6000 亿。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恰恰是中共放松控制、老百姓辛勤劳作的结果，而不是中共夸耀的所谓“政绩”。而且，繁荣的下面隐藏着深刻的危机。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专家估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 0.5 到 0.6 之间，远远超出联合国规定的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大规模的国有财产流失（中共承认 2004 年损失高达 3521.2 亿元）和贪官污吏卷款外逃（2004 年 8 月 16 日的《法制晚报》报导，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尚有 4000 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 500 亿美元），正在把脆弱的中国经济体系逼向崩溃的临界点。雪上加霜的是，中共又

们的思维习惯，谎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党文化教人学流氓说脏话

除了撒谎之外，满嘴脏话也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把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自称流氓无产者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按照历史记载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当年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靠偷鸡摸狗过活的社会流氓地痞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义的启发和苏共的栽培，中国共产党也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中共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毛还在 1964 年 8 月 18 日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里说，“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中国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刘邦年轻时在沛县当亭长，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夺得政权之后，也懂得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叔孙通和他的门徒一起，制订朝仪，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义、清静无为令天下休养生息。古时的流氓也知道维持政权得用正统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

但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氓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里，处处充满流氓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理是“封资修”，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的牛粪最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你要觉得牛粪是臭的，那么就说明你的阶级感情有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说牛粪是香的，越闻越香。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把人变得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互联网论坛上，充满脏话和诅咒的帖子可以说是中文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来可以平心静气讨论，却变成了某些人用各种下流恶语进行谩骂和大搞人身攻击撒野的地方。在被党文化灌输的仇恨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偏见之下，民主、人权、台海、法轮功、宗教信仰、外交关系等等话题，都能成为被下流谩骂的牺牲品。

从最高领导人的流氓语言，如“脱裤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写进教科书，到文革全民运动中对流氓行为和语言的鼓励，再到八十年代以后引进《上海滩》之类流氓企业家影视作品作为样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为了大家可以观摩效仿的对象。

在目前的社会中，信仰缺失，理想破灭，权力、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人们受进化论学说影响，争当欺压别人的强者，认为成功需要“匪气”。一般人没有随便打人的权力，骂脏话就可以起到让弱者畏惧、给自己壮胆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谁？”正是脏话背后天不怕地不怕心态的真实写照。

党文化使人举止行为低下

如果你直接对一位当代的中国人讲，你行为低下，很可能十个有九个觉得你有问题，自己的行为非常正常，哪来的低下？

2006 年 9 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公众反映比较普遍的大陆游客国内国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

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

- 1、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厕所不冲水，不讲卫生留脏迹；
- 2、无视禁烟标志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间，危害他人健康；
- 3、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争抢拥挤，购物、参观时插队加塞，排队等候时跨越黄线；
- 4、在车船、飞机、餐厅、宾馆、景点等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呼朋唤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闹；
- 5、在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不尊重当地居民风俗；
- 6、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赤膊袒胸，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翘“二郎腿”，酒足饭饱后毫不掩饰地剔牙，卧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碍观瞻。
- 7、说话脏字连篇，举止粗鲁专横，遇到纠纷或不顺心的事大发脾气，恶语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养；
- 8、在不折扣的店铺讨价还价，强行拉外国人拍照、合影；
- 9、涉足色情场所、参加赌博活动；
- 10、不消费却长时间占据消费区域，吃自助餐时多拿浪费，离开宾馆饭店时带走非赠品，享受服务后不付小费，贪占小便宜。

国内的常见不文明行为，和这十条大同小异，但多了一些内容。比如，在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乱划，蹂躏禁行绿地，攀爬摘折花木；不听劝阻喂食、投打动物，危害动物安全等。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这些人尚且如此，一般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人就更不能幸免于这些低下行为。

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这样吗？其实不然。巴黎圣母院“请保持安静”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去过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都会看到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场合有中文的地方并不多，而其他国家包括法国的游客并没有这种“礼遇”。泰国皇宫洗手间里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请便后冲水”。美国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频频出现。

中国人以前这样吗？中国叫礼仪之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第一，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重视礼仪的传统。《论语》上有一则故事，孔子警告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学礼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曾经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中指出，做儿女的，从小时候起，就应熟习在不同场合的各种礼节，学习礼节仪文之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训”、“学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人与人交往，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礼的规定。即使是吃饭，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际显示出自己的修养，谓之食礼。行为合于礼，是有修养的表现，反之则不能登大雅之堂。

个接着一个，“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清阶”、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自由化、六四、镇压法轮功……每一场运动，都使国家和人民大伤元气。中共政权把中国人民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奴役状态，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权都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出卖国土

1999 年 12 月 9 日和 10 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将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还有唐努乌梁海地区及库页岛在内的至少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被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正式划入俄国版图。2001 年 5 月，江泽民又与塔吉克斯坦签署协议，将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争议的领土拱手出让给塔吉克斯坦。

江泽民为了换取外部支持以巩固权力，黑箱作业，承认了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为无效的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将大片本来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门一样回归祖国的土地，奉送给俄国，断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后路。中共高层意识到，江的卖国罪行一旦败露，必然危及中共统治，于是只好和江泽民沆瀣一气，极力掩盖。

破坏环境

共产党极端狂妄，蔑视一切自然法则。在其建政的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经济没搞上去，却使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改革开放以后，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过度透支了生态资源。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共产党留下的生态环境，几乎已经无法承载起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华夏子孙。

中共环保总局承认，目前中国被酸雨侵害的地区占国土的三分之一；由于空气污染使得 4 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 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水污染使日益短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 41%（注：劣五类已丧失水功能，甚至不适于灌溉和观赏），3.6 亿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城市河段 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由于污染造成的癌症村自西部的新疆到东部的黑龙江，南至云南、广东，北至内蒙古，几乎遍及全国；中国还有超过 90%的天然草场退化，年增退化草地 200 万公顷；沙漠和沙化总面积已达 174.3 万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 3436 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一年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由于耕地被占用，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在 4000 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 200 多万人。

以人均土地和自然资源占有量来说，中国本来就居于世界后列。照这样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无可耕之田、无可饮之水、无可供呼吸之空气，这绝非危言耸听。虽然中共官方现在也大讲“可持续发展”，但中共一切以维护自身统治为根本目的的短视特点，决定了这只能是一个装点门面的新名词而已。如今，中国许多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后果已几乎不可逆转，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

杀害中国民众

中共建政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杀害四千万人，加上三年饥荒中饿死的四千万，共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中外学者根据已经公布出来的史料，经过反复的统计研究，最后估算出来这个结果。因为中共各级政府公布出来的数字多数都是

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还有大小各级党委官员几百万，不知得浪费百姓多少钱。一般国家老百姓纳税养活政府，中国老百姓除了养活政府还得养个庞大的贪得无厌的党，所以中国百姓才如此不堪重荷。

可是，人们为什么感到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问题呢？一方面这是个心理问题。因为共产党通过灌输造成自己同民族和国家融成一体，党亡国不在，就象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的孩子，对于母亲不在的情形是不敢想象的。但问题是，共产党从来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强加于中华民族的附体。第二就是中共强行攫取所有资源与财富，造成人们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假相。事实上没有中共，中国人照样还是中国人，中国的国家该怎么管理还怎么管理。中国社会几千年没有共产党，不还一样好好地走过来了吗？

另一方面，人们这么说，还是因为担心共产党没有了，国家可能陷入动乱，所以，与其动乱，不如现在赖活着。表面上想，这是一个避免动乱的办法。真正一想，就会发现，恰恰中共的统治是动乱之源，中共的统治在激化矛盾，中共在压制社会不满，可以说动乱的来临是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必然。现在维持中共，不但不能避免，反而是在加速这个动乱的到来，加剧动乱的破坏力度。中国现在各种问题的疏解办法恰恰是被中共堵死了，因为那些疏解办法威胁到了中共的统治。只有没有了共产党的因素，才能公平健康没有后顾之忧地讨论中国的问题，改革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全面进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体中共，为其他事情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而不是被“没有了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迷惑住。

“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上世纪末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已经破产，中共的高官自己都说共产党倒台“不出十年”，2004年人民日报高调发表社论让共产党“再干一个二十年”，可见共产党自己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过是“二十年”。人们不是也常说“再过二十年，中国怎么也得民主了”吗？显然，人们早就已经对共产党垮台达成了共识。那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就显得很多余吗？

所以，不是“共产党该不该垮”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共产党垮台”的问题。更明智的问法是，“如何让共产党垮掉而不引发社会动乱？”靠革命的暴力手段，显然不妥。暴力带来的只是新的暴力，共产党的统治造成了人们文化和心理上的断裂，只有让人们真正反思共产党才能避免共产党的覆辙。现在中国兴起的“退党大潮”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佳手段。退垮中共的过程就是一个民众觉醒的过程，就是接受中共强权将要垮掉这个事实的过程，也是各种新生势力成长的过程，而且在成长过程中自觉同共产党的暴力原则划清界限的过程。只有中国人民的心灵真正解脱了，有了理性的民众，中国才会平稳过渡。

不少西方政客也怕中共垮掉，担心中国出现的破坏性动乱会冲击世界秩序，于是希望“让世界去兜住中共”，帮助中共维系政权。显然，这是非常不明智的短视之举。因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定会出问题，而且等爆发的时候问题会更大，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那么有了共产党，中国到底怎么样了昵？

4) 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回顾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号称“推翻了三座大山”、“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中共恰恰成了中国人民头上最沉重的大山。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斗争、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交织的历史，运动一

可以说，当时社会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养、礼仪、行为高雅得体，如果想被社会接纳，就要修身养德而规范自己的行为。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也一直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现在的韩国和日本仍然继承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礼仪规范，人们还比较重视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

中共的党文化里边有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部分，鼓励人们互相倾轧，没有提倡对个体的尊重的部分，宣扬粗鄙，在个人行为中，不考虑他人，随随便便，我行我素，怎么方便怎么来。

现在大陆民众对“性”的认识，更是“与时俱进”，“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开对待，把“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活动，很多人还认为是进步。这种低下行为导致了社会伦理的混乱，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都打破了。有人觉得外国人不是也很性开放吗？但是，在西方社会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约束在那里，事情不会太过离谱，现在连西方人到了大陆，都感慨大陆性之开放早已“胜于蓝”了。

心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现象，就是从众效应。讲的是，个人总是倾向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不知不觉地在认识和行为上和多数人保持一致，以证明他自己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与一个群体之中。同样，在这样的粗鄙党文化占主导的社会里，把卫生习惯差、教养程度低的人作为行为模板，人们不效仿的话，自己都觉得怪怪的不合群。人们形成了习惯，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被党文化改变得低下了。

中共基于进化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认为新的东西是经过筛选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比旧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后的。因此，人们按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党文化为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对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传统风俗、传统习惯文明进行破坏，礼仪教养被作为封建主义批判，整洁文明被当作资本主义唾弃，延续了几千年的礼仪之邦的文明被摧毁了。

4. 去掉党文化，人们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

说今天的中国人离开党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维了，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了，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带有“侮辱”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党文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早已浸透人们思想的各个角落。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通过各种灌输手段造就了整个社会由党文化构成的环境，让人们耳濡目染。同时，在否定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批判掉儒释道之后，使中国人接受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思想，造成了中国人建立在党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善恶标准。中共的逻辑成为大众的逻辑，中共的语言成为大众的语言，这种逻辑和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思想。把党话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日常词汇，进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使得党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们说话时，习惯性地把头脑中的党文化思维当作自己的思维。

那一套话语、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内在变异含义，是由中共强加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达方式，只有接受过党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够理解和解读。这种强行灌输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党文化话语模式、行为和思维模式的现象，无论中国传统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主流文明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中共统治下的人们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与中国的传统

社会、世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的讲话与行为，也经常让人觉得怪怪的无法理解。

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党话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与自然语言不同的是，党的一切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取代了正常社会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语言交际的内容，中国人就生活在党话编织的社会结构里。

中共建政以后，“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广泛的词语之一了：政府号称“人民政府”，军队叫作“人民军队”，钱币叫“人民币”，甚至走的马路也叫“人民路”，还有“人民电台”，“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人民医院”、“人民银行”……和一切共产国家一样，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被称为“人民”的各种设施、机构、团体暗示着每个人的一切利益、权利似乎都有了具体落实，不必自己再费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圣的光环，以至于小民百姓都战战兢兢弄不清到底谁是人民。

有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 70 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场”购物，“人民营业员”态度粗暴，顾客质问：“你这是为人民服务么？”答曰：“为人民服务？你代表人民？”顾客竟一时结舌。

当然，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发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国，虽然“人民”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在中共党文化里“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权划定谁是“人民”，谁不是；而后者就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而剥夺其权利。他们通常被冠以另一个特定称呼：“一小撮”，尽管这“一小撮”有时候多达成百上千万人，比如 1957 年给中共提意见的“右派”、1999 年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群等等。“人民”一词虽然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在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当人们习惯性的在各种场合使用着“人民”、“一小撮”等词语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中共对于谁是或不是“人民”的随意划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图进行政治划分和站队。

类似这样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党文化词句还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纪末，学生从学校毕业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词就表明“党”具有支配权，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中就觉得饭碗是中共“赐予”的，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特别是很多警察在追随中共迫害民众的时候振振有词：“共产党给我的饭碗，我就得听共产党的。”

党话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意志、党的运作实施的载体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国家手段和国家功能完成党语言的体系建立、规范和使用。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舆论媒体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历来报纸、文件、官方讲话、学校教材都是统一传播党语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运动生造出大量新词。各级组织带领群众使用并沉淀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党传统、党文化的基础。规范文艺、电影、广播、戏剧，树立党文人、党文化样板，推行党话语标准化。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恐惧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党话语建立过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这一切都使得党话语系统成为中国人说话的主导。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随口说出整段整段的极其标准的党八股话。

印度人口和中国处在一个数量级上，和中国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 年代，几乎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期，印度在总理拉·甘地的领导下，开始了温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 年开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 年到 2002 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 6%，2002 年到 2006 年年均增长 7.5%，速度上已经接近中共宣称的 8%。但印度的银行坏帐占有所有贷款的不到 2%，远低于中国；基尼系数 0.33，而中国同期的基尼系数可能高到 0.5 到 0.6。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而印度 GDP 增长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来自增加资本或劳动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术制造业。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

军事和国防也是中共时常夸口的题目。自古“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共从斗争哲学出发，几十年来以一种战争臆想狂的心态不断扬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中美必要一战”，其实是其通过树立外敌来化解国内矛盾的惯用统治伎俩。其实，真正热衷于“输出革命”、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恰恰是共产党政权。中共用于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耗资约 41 亿美金（按 1957 年价格计算）。有人算过一笔帐，如果把这些钱用来买粮食，可以把大饥荒饿死的所有四千万人救活！如果国防的目的是要保护百姓，那这种害死百姓的国防有多大意义呢？且不说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该不该，至少，搞出点武器根本就不能作为在百姓们面前炫耀的资本。再说，那些没有共产党的国家，难道就不建设国防了？

台湾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明居正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假设，很有启发性。他说，如果 1949 年以后大陆政权遵循孙中山的遗教，走了三民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情况会怎样呢？

“1949 到 1952 不会有五大运动，中国也不会跟美国打仗，也不会被美国封锁，……不会去搞大跃进运动，……中间很多事情也不会发生，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会出现，我们中国少死了三千万到四千万的人民，……当然更重要的不会爆发文化大革命。到了 1970 年代，经济就继续起飞，人民会越来越富裕……”。

如果这个遵循三民主义的政党继续执政，到了 1980 年代，中国的经济人均所得大概四千到五万美元。到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就应该达到美国的一半，而经济总量则相当于美国的 2 倍多。中国毫无疑问，早就是世界第一强国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走的是孙中山的道路，而不是共产主义的道路，一路走下来，中国早就崛起了！”

中国古代有个词，叫做“休养生息”。就是政府省刑罚、薄赋税、轻徭役，与民休息，简单的说就是政府不折腾。中国人勤劳勇敢，只要社会公正，别搞运动，别瞎指挥，老百姓自己就会想办法富裕起来了。中共自己都说，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中共几十年的瞎折腾，中国至少三十年前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现在，因为中共的专制、腐败、浪费，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社会秩序和败坏的社会道德，已经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共自己承认的，每年公款吃喝 2000 亿，公车消费 3000 亿，公费出国 2000 亿。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 30%左右，浪费 4000—5000 亿元，连吴邦国自己都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

出不穷的新问题中苟延残喘，中共大力宣传“和谐社会”、“胡温新政”、“可持续发展”等，企图用这些戴着“科学”、“现代”光环的新名词唤起对现实不满的中国人对未来的希望，给人以中共“有决心”根治种种问题的假象：中国问题最后还要靠党来解决。

同时中共大搞国庆阅兵，用网络和媒体宣传军队和武器建设，鼓吹打台湾、打日本，大国崛起，铁血扩张，意图显示的是共产党使中国国力军力扩张，没有共产党建政以来做的“好事”，就没有今天“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3) 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怎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这些成就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中共常常吹嘘的成就包括：取得民族独立，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了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建立了强大的国防体系，拥有原子弹和核潜艇；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等等。

但事实上，中国真正的民族独立、跻身国际四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台湾的都是国民政府在 1945 年做到的。中共建政之前从事的是分裂和内战，建政之后则致力于奴役民众，大搞政治运动，逼迫人民下跪。

中国的经济体系在中共之前就已经颇具规模。中国江南造船厂在 1918 年就给美国造了四艘万吨轮，1920 年 3 月下水，美国运输部验收，质量非常可靠。1929 年辽宁迫击炮厂就造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其他如火柴、油漆、机床，甚至军舰、飞机等等，现代工业生产的东西很多都在国民政府、北洋政府甚至清政府时期就已经成型。

说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到底谁在种地？谁在盖房子？谁在搞科研？还不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大众百姓？哪个活儿是中共干的？中国人民的衣食和财富是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是自己挣来的而不是中共恩赐的。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是人民养活了中共政权，而不是中共政权养活了人民。中共的无耻在于，全面剥夺了人民的财产，最后给回一点你自己创造的财富，却还要你去感恩，要你“感谢党的英明政策”。

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学里有一个名词，叫“机会成本”。意思是说，人面临抉择时，他必须作出一定的选择，他所失去的就是他所得到的东西的机会成本。中共吹嘘自己的“伟大成就”时，总是纵向比，而不是横向比；总是和战乱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总是说做到了什么，而不提没做到什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半个世纪以来非共产国家和共产中国的不同道路，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共产党，凭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获得比现状不知强多少倍的辉煌成就。

我们首先以经济为例。中共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那我们就看看同样人口多、底子薄，但没有共产党的东邻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39.3 人（1998 年数据），几乎是中国的三倍。日本国土的 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贫瘠、资源缺乏，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二战以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起步，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不但摆脱了战争给经济带来的阴影，而且超过传统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 1955 年到 1973 年，就在共产党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十八年以年均 10%的速度高速增长，被世人称为“日本经济的奇迹”。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决不是仅仅具有修辞的意义。人们都讨厌党八股，可是从中共的文件、讲话、汇报、总结、报纸社论、大中小学教科书、新闻、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复的恰恰是中共制造的那些党话，这些话并不因为人们讨厌它它就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它们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随时都会发生作用，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厨师，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后移民到美国加州定居。在餐馆厨房剁肉时，伴着一刀一刀的节奏哼着小调，煞是来劲。不过，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苦功夫”，别人给他指出，连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们的思想中被灌输的太多的党文化的东西和太多党文化的话语了，成为了人们思维逻辑和讲话的自然部分。

中共建政之后，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的牢笼，但中共却宣传为“解放”；中共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伤害、对中国人的迫害超过任何一个异族，但中共却称之为“新中国”；中共的瑞金“苏维埃”“革命政权”从事的其实是国家分裂活动，是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中共“长征”其实就是一场大逃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际上是非法种鸦片的运动；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式的精神迫害；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一场人祸；“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和政治大清洗；“改革开放”其实是暂时放松了专制高压，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数……诸如此类，如果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词的骗人光环。但是，因为中共的灌输和话语垄断，人们一直沿用，如果去掉这些词，很多人真的会不知道怎样去描绘去思考那些历史事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明明被共产党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对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权，就说是“搞政治”；西方有人一批评中共，就说是“反华势力”；海外华人抗议中共的暴行，就被认为是“不爱国”，是“抹黑”；听说了中共出卖大量领土，反而去给卖国的找台阶，觉得党这样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瞻远瞩”（把他卖了还帮人数钱）；听中央电视台一年 365 天的灌输觉得很自然，收到几个揭露中共恶行的电话、邮件，或者几十分钟的真相插播，就认为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一个行凶的犯人，人们要追根究底，绳之以法，而面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人们反而总是认为共产党善于犯错误，还会“有勇气改正错误”……人们自然流露的思维中，那些词语“平反”“搞政治”“反华势力”“不爱国”“抹黑”“高瞻远瞩”“破坏社会秩序”“有勇气改正错误”等等，都是中共高调宣传的词汇，却早已成为了人们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国，人们的口头禅很多都是很有中共党文化的语句。比如“同志”，“贯彻”，“领导”，“号召”，“基本原则”，“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将×××进行到底”，“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下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团结就是力量”，“红星照我去战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形势一片大好”……去掉这些党文化话语，很多人可能觉得日常基本表达都会很吃力。党文化语言对中国人的控

制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所谓的新词也是在党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来的

党话不是停止不变的。人们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就象是加工厂，机器和流程都是现成的，来的新信息和社会现象经过党文化思维的加工就成了新的党话。它们属于党的系统，具有党要的内涵，但是又因为不是赤裸裸的党的意识形态内的词汇，所以更不好分辨。

当今网络上流行一个字母缩写“FB”，这两个字母原本是腐败的拼音字头，一般代表吃饭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当说，“今天去腐败一下”。这个词诞生于民间，本身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它是在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造出来的。它把本来属于负面的腐败行为正规化，弱化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压力，实际上也认可了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暗示中共的腐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好比人们若习惯把日常的正常行为称做偷窃，则真正的偷窃者就不会再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

“弱势群体”一词，也是产生于民间，随着频繁使用，2002 年开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现了。这个词通常指不适应社会变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如从原国有企业失者，农民工等等。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影响下，人们往往以为这个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是适应社会体制的变革而被淘汰的人群。这从根本上掩盖了“弱势”其实是由中共非人性的专制制度造成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群体其实是被中共专制制度压迫和剥夺权益的群体。以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为例，中国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地位低下，这完全是中共的歧视政策造成的。这种歧视可以和恶名昭著的前南非种族政策相比。这里引一段中共四十年前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对南非的概况描述，读者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农民和非洲黑人的境况：“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证法”来说，这项法令规定年满十六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二十多种，以备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 1958 年，就有将近六十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证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但在党文化的洗脑下，清醒认识到中共的歧视政策并对此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并不多。

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词，比如“中国特色”、“四个现代化”、“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下岗”、“待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扶贫”、“三讲”、“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不健康内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学”、“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等等。这些新词也都是党文化的产物，被中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用这些词语来为维护中共的统治，信息有没有害不是对人民而言，而是对中共有没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给人们弄一个民族主义的画饼，让人们忘掉社会的危机而去拥护中共。中共继“三个代表”之后，又搞了“八荣八耻”，其实，里面的每一条内容都是在党文化的范围中讲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爱国主义？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定义。符合共产党的就是“尊重科学”，拥护共产党的就是“爱国”的主义。

样板戏、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字报、电影、宣传画、教材等等向全国推广，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全国山河一片红”、“解放全人类”、“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革命事业大显身手”、“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名为搞革命，实际还是要共产党当领导。根本的意思是，必须时刻警惕和清除无所不在的“敌人”的“破坏和颠覆”，以免中国人又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巩固和发展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谓“新中国”。

1976—1992 专制统治下的经济改革开放

1976 年文革结束后，中共鼓吹“平反”、“打倒四人帮”“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四人帮的爪牙、余孽”等等，又用中共统治遇到危机而不得不停止对民族的疯狂劫掠和破坏后，社会各层面开始复苏引起的变化，来证明党“执政的能力”和“纠错”的决心，证明党有“拨乱反正”的能力，中国走出混乱状况，建设“新中国”还是要靠共产党。

1979 年后中共着重宣传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指导思想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经济上生活上一切好的变化，把中共放弃用马列毛的思想强行“指导”经济、科学技术领域后，社会从停滞走向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无视中共建政之前，中国一直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社会的封闭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1989 年以后，中共反对“自由化”，宣传六四屠杀的正确性。国民经济摆脱中共的层层枷锁后逐步复苏、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成了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注解。中共借机制造混乱逻辑，宣传没有共产党镇压学生，中国就会解体、就会乱，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还是宣传中国离不开共产党。

1992—1999 经济发展时期

“GDP 成长”、“宏观调控”、“发展才是硬道理”、“抗洪斗争胜利”、“申奥”、“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三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宣传歌功颂德，说共产党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领导了经济建设，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归根到底，由于中国的潜在消费量、中国人的勤劳，以及过去几十年中共对社会经济破坏造成的中国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还有巨大的经济成本投入，以破坏生态资源、摧毁社会道德为代价的所谓经济“高增长”，目前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物质需求。中共却借机继续鼓吹，似乎一切成绩只要靠中共才能取得。

1999—现在

“三个代表”、“揭批法轮功”、“和平崛起”、“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强国富民”、“经济奇迹”、“保持先进性”、“抗非典”、“胡温新政”、“科学发展观”……中共在各种媒体中大肆宣传物质的消费繁荣和 GDP 成长，宣传富人的生活方式，宣传房地产和各种建设项目的实施。由于中共所谓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延续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盲目的经济“高增长”伴随而来的弊端逐渐引发社会不满，如对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污染、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摧毁引发频频出现的“百年”乃至“千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农村和城市、西部和东部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造成的社会贫富分化、对国家长久发展的基础——教育方面的长期低投入、医疗方面不合理的政策，以及极端的物欲追求带来的社会道德下滑和腐败等等。为了在层

予日军重创，最终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在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失去任何蛊惑人心的能力的今天，中共频频祭起民族主义大旗，自封为中华民族的正统代表，因此决不会放弃对“抗战中流砥柱”这一顶桂冠的占有。可是事实真相是，在最需要全国人民精诚合作、抗击来犯之敌的时候，中共却可耻地背叛了祖国和人民。

2) 不同时期的改头换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许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在中共的宣传下，其中的“新中国”却不只是指中共 1949 年建立的“新中国”，也指中共建政后各个时期的中国，这个口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这句口号就是党文化宣传中的指导思想，各种具体的宣传内容都是以它为指导。宣传中用各种办法，讲各种口号，说各种好事，剖析各种社会现象，都要用来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看看这句口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宣传中的体现。

1949—1959 巩固政权阶段

文工团、秧歌队、游行、标语、传单中讲的都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翻身得解放，归功于共产党。”中共建政之前由于外敌入侵和中共为夺取政权而四处搞武装割据引起的长期战乱局面，正好作为“旧中国”的“黑暗”来反衬“新中国”的“优越”。

土地改革中宣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韩战中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意为没有共产党，中国就要亡国。事实上韩战是金日成主动发动对南韩的侵略战争，导致联合国通过决议进行干预，矛头根本不指向中国。说美国觊觎中国完全是中共的杜撰。1950 年秋林彪当年称病拒绝入朝时曾指出：“美国无意侵略中国，否则三年内战中早已介入。”而中共牺牲五十万以上官兵参加韩战，扶植的却是屠杀饿死一百多万本国人的北韩独裁政权。其一意孤行的核武试验，现在也威胁到了中国。

以《白毛女》为代表，各种形式的文艺从作品不同角度宣传“旧社会”与“新社会”的对比。旧社会指 1949 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国民党统治、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或称旧时代。讲“万恶的旧社会”，“新旧社会两重天”。以 1949 年中共建政为界，此前是反动、压迫、黑暗、剥削、丑陋、愚昧、灾难、恐怖、不义，此后是进步、解放、光明、福利、美好、文明、幸福、和平、正义……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中心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社会”和“新中国”。

1959—1966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中共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中宣传“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民大炼钢铁”、“以钢为纲”、“毛主席要咱们大跃进，公社化，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攀登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梯”。

这种宣传力图使人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突飞猛进”实现了一个个所谓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已不遥远。所以中国强国要靠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新中国”。中共至今不敢公开的是，中国有三、四千万人因此而被活活饿死，却被中共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6—1976 文革阶段

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里，儒家讲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讲与人为善，道家讲顺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把中华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历史说成是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眼里，甚至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权势倾轧等等厚黑诡谋的争斗史。中国人都相信读史可以使人明志、可以明理、可以增进智慧，可是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如中共描绘的是充满奸诈、一片黑暗，人们又何从明志、明理？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实恰恰是自己内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武装”大脑的人，看到的中国历史自然也就是争斗与厮杀，而看不到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之无私、将相和之宽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刚直不阿，也看不到苏武的不屈气节、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飞的精忠报国。

今天的中共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人们的思想仍然受“阶级分析”的影响，“怀疑一切”、“深挖思想动机”，迄今仍然是许多人判断事物时的第一反应：分析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因为学生领袖的动机不纯，所以他们应当承担一切责任，开枪杀人的中共反倒没有什么罪责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其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中共的罪恶是否属实反倒不重要了；农民工辛苦一年却薪水被骗，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其动机是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惩治，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和造成惨剧的社会制度反倒没有法律责任了；中共发动“大跃进”活活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因为其动机据说是为了“赶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谅的了。

中国人的思维受党文化影响，受党文化支撑，其中唯物辩证法讲阶级斗争，进化论讲弱肉强食，简单的把中国历史看成血雨腥风的斗争史，这些都给中国人加深了斗的意识。中共反反复复种植暴力为核心的共产文化，把几代人造就成满怀仇恨、向往冲杀的“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新人”、“党的驯服工具”。中国人的斗已经在思维里起主导作用，中国人喜欢内斗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事实。互相拆台，争斗得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变成了麻将规则——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别人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妒火中烧。于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绊子。斗还不光为了利益，而是以摧毁对方人格为目标，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国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不理睬任何规则。

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事情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衅的意味，说出的话刺人。如果说不通，往往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理辩三分。

有人做过一个小测验，问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如果到一间教室里觉得很热，要打开窗户的时候会怎么说。来自台湾的学生多倾向于：“太热了，我把窗子打开，你介意吗？”而来自大陆的学生则倾向于说：“这么热，怎么还不开窗？”两句话的意思相似，但反诘句使对方陷入被动，似乎没开窗是不正

常、不应该的。后面这句话的说话者其实往往是无心的。这是因为党文化的争斗之心已经深入人们的话语习惯，人们都已经习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在谈论国家大事时那种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怀疑一切的态度，让人很难平和的沟通。说他怀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怀疑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吧，他说哪个党没有干坏事；说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挠全面的改革吧，他说那是国情所限；说共产党正在迫害人权吧，他说证据在哪里；你指出证据吧，他说凭什么相信你的证据；说他喜欢共产党吧，他却忙着把财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国；说他不喜欢言论自由吧，他却很爱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为共产党的恶行辩护……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你列出很多共产党干的坏事，他一个一个地否定，胡搅蛮缠，总是为中共找理由，问你证据在哪里；说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驳说塞块布就完啦，傻子才会费那么大劲去割喉管；你说网上都有，他还是振振有词，问你谁看见了？他说网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当你说出张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来行刑前割张志新的喉管却是共产党自己都高调承认的。

人们跳不出党文化的思维定势

党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个“场”，只要顺着党文化去说话去思维就如同“顺水推舟”，“如鱼得水”，显得格格外“自然”和“理直气壮”。相反，想要去澄清党文化的变异思维，反而显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们就越迷恋于党文化，越难跳出党文化。

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们不但用对共产党的“爱”来为共产党找借口，同时，还用对共产党的“恨”来为共产党辩护——他可以用“经济的表面发展”来给中共涂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强权，杀人不眨眼”来抵触揭露中共恶行的努力，认为“没有用”，从而继续维护中共的统治。他一方面说：“多党制是人们私下的共识，很多党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会走到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来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针对人民组建民主党派，他会说“那是胡闹！共产党是强权，怎容得了你？”以此作为反面认识来维持中共的现状。对中共的爱可以在党文化中找到共鸣，对中共的恨可以在党文化中得到宣泄，于是，党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系统，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共产党的“爱恨情仇”，让人不想离开了。

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共产党杀了八千万中国人，该不该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杀人偿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当然应该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他回答不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会转弯抹角的把问题弄得很复杂。他会问，“你怎么知道有八千万？你亲眼看到饿死了四千万人吗？”你说中共自己内部都发表透露出这么大的死亡人数。假设你把材料给他看了，他还会说，“你这不是以牙还牙吗？你总得给人犯错误的机会吧？”你说杀人犯在法庭上能为自己开脱，要求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吗？他还会说，“总不能都是共产党的错吧？”“非洲还有国家也搞大屠杀呢！”“共产党现在变了，干吗揪住过去不放？”“共产党是什么？谁敢清算共产党？整死你！”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的简单答案：该还是不该。逼急了，他会告诉你，“跟共产党作对，有什么用处？”“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总而言之，共产党杀了多少人，都是没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为，逍遥法外。

我们看到，当要他去掉党文化来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时，他就以“没有意义”来应付了。离开党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维了，共产党成了他的思维底

名词。如果说什么东西是新生事物，那它一定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未来”。同时，它的任何缺陷，都是“新生事物的不成熟”造成的，在一个不可确知的将来，这些缺陷都可以逐一克服。共产党也的确是这么给自己辩护的。

这首歌出笼的背景是：1942年，领导国民政府进行全面抗战的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有一句话，“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躲在延安“整风”的共产党针锋相对的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声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因此，这首歌的主要内容是讲“中共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领导抗战”既不是中共的主观愿望，也不是客观的事实。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中共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借机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夺取政权。中共在名义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舆论收买人心，暗地里“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壮大自己”，甚至与侵华日军暗通款曲，倒卖鸦片。应该指出的是，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历时十四年，国民党1932年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进行了长城抗战，但中共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在江西建立了割据政权。中共一直说是“坚持抗战八年”，等于自供它在1931年到1937年之间根本没有抗战。

中国大陆出版的《刘少奇年谱》显示，作为中共在江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刘的全部军令、报告，竟无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于如何打击或分化国军。中共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这次战役被中共称为其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但在中共的历史记载中，从来不提第二次、第三次胜利，因为这是中共参与的仅有的两次较大战役之一。“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成为彭德怀的“罪状”之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用这件事打击彭德怀，“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1972年，毛泽东还对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你们不用道歉，如果没有你们的到来（侵略），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政权。”中共到底是积极抗日，还是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从毛的话中，答案一目了然。

中共在其“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也很能说明中共对抗日的态度：“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显然，中共真正的敌人是国民党，八年来中华民族抵抗外辱的浴血奋战中共提都不愿提。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主办的“民族魂”网站上，罗列的“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死于同国民党的战斗中，只不过时间是属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已。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战斗英雄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无一牺牲在抗日战场。

与中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毛泽东讥为“下山摘桃子”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间，领导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共在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中较量，牺牲将领200位以上，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在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

第五章 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

前言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一点是标语口号满天飞。网友收集的“中国标语大全”，内容涉及计划生育、打击犯罪、封山育林、普教扫盲等等，还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口号，其粗暴野蛮、荒谬可笑，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可是国人几十年生活这样的环境里，还以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因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共产党为什么在文宣方面如此重视标语口号的作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标语口号简短、上口、形象、易记，作用直接，效果持久；第二，因为标语口号往往十分简短，不可能包含复杂的论证过程，因此它们所宣传的理论政策本身的荒唐错误、似是而非就被掩盖起来，不易为人察觉。

有一组口号，贯穿了中共几十年的暴政史。这组口号集中体现了中共的集团目标，中共曾花大力气反复灌输并用各种文艺形式图解渲染。虽然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组口号有时候会改头换面，以另外一种或多种形式出现，但其精神实质没有变化，其目的就是巩固人民对共产党的依赖和顺从，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组口号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爹亲娘亲没有党亲”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们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中共的灌输手段，不管是宣传机器、文学作品、教科书，还是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文艺形式，都好比乐器，它们是中共用来灌输党文化的工具。当然，具体创作者随着时代或者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不同，用的素材可能不一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从这些乐器中出来的曲子，可能曲调千差万别，但是表达的主题却与这四句口号一脉相承。如果从具体的种种现象回到它们的主题和要表现的东西上的话，那这四句口号就是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宣传中常见党文化的创作指导大纲。要是想弄明白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的形形色色表现的实质，就不能不剖析一下这四句口号。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歌声与谎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 他坚持抗战八年多 /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 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这首传唱极广的中共颂歌创作于1943年，当时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50年毛泽东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歌词于是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这一个“新”字，加得很有讲究。当时的中国人，都有在中华民国生活的经历，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和这些人的人生经历相左，不易使人信服。此其一。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共产党的词典里，“新生事物”是个有特定涵义的

线，任何“没有共产党”或“清算共产党”的思维对他来讲，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他就此打住，是因为他不敢触及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更不敢正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们常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中共政策的认同：“我要是邓小平，我六四也会开枪”，“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搞独裁专制”，等等。人们这么说会觉得自然，感到安全。“我要是某某某”，本来是用于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假设一下，用这种方式来重点突出“我”的态度。但是，当用于中共的时候，“我要是某某某”就变成了用“别人(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我该不该”了，重点不是“我”的态度，而是去表达中共的态度，“我”被藏起来了，从而默认、怂恿中共的恶行。追问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会说，我的态度不重要，“没有意义”。就是说，要他回到正常思维时，他又觉得“没有意义”了。其实，人们应该向好人看齐，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正义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时，应该如何。就算胆小，不敢说“我要是高智晟律师，我也要如何帮助被中共迫害的人们维权”，也决不当非要把自己比作强奸犯、杀人犯或是独裁者啊，这不是个很可耻的比方么？

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局限，也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党文化中，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就如毛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过去中共不承认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办法是给它们一概加上定语“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虚伪的”，“无产阶级”不需要；今天则换上“中国的国情特殊”的借口加以拒绝。受党文化这种狭隘思维左右，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现诚信危机、当善恶有报被贬成“骗人的迷信”之时，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义了。

中共通过长期赤裸裸的宣传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领导人”的伟大，从昔日的宣传马恩列毛之“伟大”、歌功“红太阳”，到今日的吹捧“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造成很多中国人以宗教的虔诚信任“中央领导”。许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边中共地方官员的腐化堕落，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央领导”的良好印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领导”都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攀升上来的，但人们并不去琢磨为何贪腐的地方官员一旦进入“中央领导”阶层就会变得“英明”起来。所以坏事都是地方官员瞒着“中央”干的，重大问题只要“惊动了中央”，或“中央来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决了；面对中共几十年来造成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很多民众宁愿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央领导”总是有办法解决的，而不是如自由国家民众那样，对于国家和社会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共镇压法轮功，很多人虽然不解中共为何对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如此小题大做，但第一反应往往是，“中央这么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党中央”的大脑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轮功群众到底有没有违法”，“中共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峡工程上马后，有海外专家指出其可行性论证中有重大漏洞。有网友马上振振有词地质疑海外专家的水平，并说：“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言外之意，“英明领袖”们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为人们跳不出党文化，才使得中共调动、控制人民的思想 and 行为变

得易如反掌。中共就象快死的人一样，靠的就是不断的打强心针——面子工程，三峡大坝，神五神六，争办奥运等等。我们看到无数的国人跟着中共一起振奋，一起高呼。在这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我们看不到人们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闹中感受党文化酝酿出的扬眉吐气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烧钱搞面子工程，而不关心对老百姓生死攸关的事情，要的就是为摇摇欲坠的统治“涂脂抹粉”，欺骗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医疗的保障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民族未来的大事，不过，因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长期以来中共对教育的资本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只有 2%—4%不到，甚至低于世界上排名一百的非洲小国乌干达。中国的医疗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过去是广大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现在是许多城镇人口也有病看不起。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对未来没有安定感，有钱不敢花。西方媒体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一面为了当世界强国而到处招摇，另一方面对于真正让中国强大的基础问题却长期忽略。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领导到底想干什么呢？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从党文化的框框中，就变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赏”中共。说是因为有意愿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不说”，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论，从经济改革会一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象有一天中国人民都全民选举选出了总统，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一样。其实，中共没有原则，只要有利它的统治，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导致中共的垮台，所以，中共在经济领域是“光干不说”，大家都去捞钱享乐，而在政治领域，中共却是“光说不干”。如果在网上搜索“政治体制改革”，你会发现在中共的媒体上这是一个热闹非凡的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全面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根本”，“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破冰启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环境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但是，人们的一切言论都是在党文化的框框中转悠，就好比一栋大楼要塌了，人们想的还是如何装潢房间的事。跳出党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线，中共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愿也不敢退出历史舞台，指望中共从良，无异缘木求鱼。

有人说领导人的更替，新一代上来，总会自由了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没有人民的努力，独裁国家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一代升任到领导岗位之后，许多人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大胆。这里的大胆不是民主大胆，而是抓权、抓钱和搞乌七八糟的事更大胆。他们就是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中吃透了共产党的那一套钻营上去的，是带着共产党的原罪上去的，他们是没有理想的，心思都在个人的、家族的、集团的利益上，指望他们把权力交给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个别人要做，他们面对的却是共产党整个的一部暴力机器和一损俱毁的利益集团。

看到中共现在的领导权交接比较平稳，有人又想了，中共进步了。其实，过去因为党的地位很稳固，权力斗争就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赤裸裸的争斗，他们没有“党要完蛋了”的后顾之忧。而现在，中共的“亡党危机”迫在眉睫，维护党的统治本身就成为中共的“共识”，党的集团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最佳保

护伞。所以，权力斗争就演变为要“维护大局”下的帮派与帮派的“团伙”斗争。表面上好象平静了，实际上，黑箱斗争更激烈了，既要维护党不垮台，又要争权夺利，矛盾更复杂，危机更深重。就象一条街上，过去是两个恶徒老在街上打架，现在是拉帮结伙，转入地下，变成了黑帮组织，这比过去更可怕。中共现在的所谓领导权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团伙化，完全黑社会化。

结语

几十年来中共改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一直没有变过。激烈的批斗大会、枯燥的政治学习、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都是中共灌输党文化的有效工具。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终究敌不过共产党的这种封闭式的舆论宣传。人们的思想真的被改造了。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在现在所谓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之下，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胆识，共襄国是。可是人民的智慧却被党文化所控制，把思考权推给了共产党，在重大国策面前只想党之所想，只做党之所做，智慧被共产党所限制。

共产党把秉承神传文化的炎黄子孙变成了不信神的民族，把敬畏天地神明的善良百姓教唆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道德败坏，什么坏事都敢做，满嘴谎言，行为低下，这样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之林“崛起”？

党文化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是深重的。共产党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为自己的恶行制造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作为一种罪犯心理，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但是不管它们自己怎么想，人民大众除了关心今天的生活，也同样关心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如果接受共产党以维护它们自己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思维和逻辑而置民族的未来而不顾，那就非明智之举了。

“给中共时间”，是人们回避中共问题的常用借口。听起来好象人们有很多选择，这次先给中共多一点时间试试看。其实，人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这么说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平衡。时间本身不可能改变中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人民的努力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根除阻碍中国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让人民回归到正常的思维，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